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1月31日第4期 总第24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8 期

【编者按】

政治发疯与文化创新：康浩（Paul Clark）眼中的文革文化

【红色文化研究】

烏紫拉 “红语”：毛泽东时代的语言

度關山 啟之 《一场文化的革命》内容详介

——康浩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前言

附：宫宏宇 不仅仅只是“红宝书、样板戏、语录歌”

——康浩（Paul Clark）著《文革文化史》述评

【红色文化评论】

阎长贵 十年浩劫与“文革健忘症”

——毛泽东留下的“红色遗产”

何與懷 2018 看《列宁在 1918》

【述往与怀人】

贺美湘 独自生存（一）：感谢愉悦（李南央 序）

鞠可光 我与老师柯玲西——一位初一学生经历的文革

【书讯】

黎云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出版

【文摘】

龙应台 文化是什么？（一）

何方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二）

【封面说明】

邹行 寡人无疾

【本刊声明】

【编者按】

政治发疯与文化创新

——康浩（Paul Clark）眼中的文革文化

“乌有之乡”的居民从来就不孤单，乡之外，有民粹+民族主义做外围；国之外，有西方左派学者做援军。本期介绍的康浩（Paul Clark）就是这类学者中的佼佼者。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作为三名新西兰的留学生之一，康浩来到北大，北大的校友还记得，这位年轻的白人学子在游泳池戏水时的情景。

如果说北大奠定了他的语言基础，那么，毛时代的电影则开辟了他事业的方向，并使他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第一位系统地研究毛时代电影的哈佛博士，第一位研究文革文化，出有专著的西方学者；第一位为文革文化叫好的人。理由是，文革的政治虽然发了疯，但是文革的文化有创新，有发展，有商业性，不但没有造成文化断裂，反而承前启后，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十年前，剑桥大学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如果直译的话，这书名应该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如果意译的话，应该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当然，还有别的译法，比如，康浩的博士毕业生，在奥克兰理工学院任教的宫宏宇先生，就把此书译为《文革文化史》。


这后一个书名，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期许，你会以为天下真有一部研究文革文化的大著，而不禁发出“东方不亮，西方亮”感慨。但是，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美好的期许，不过是个海市蜃楼——这位西方教授所说的文化，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习俗文化，与制度文化也不沾边，更谈不上精神/观念文化了。他说的只是样板戏、电影、诗歌、地下小说。更让你失望的是，他并不说这些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观念性的文化就藏在这里面），而只说它们的生产经过：八部样板戏是怎么上马的，编剧是谁，主演换过

几个，江青有什么指示。哪部电影是谁当的导演，这个导演以前导过什么，他导的片子是否被打成了毒草，挨了批等等。总之，这本书与其说是文化史，不如说是一本掺杂着文艺花絮的文革文艺大事记。唯一的不同，是在此书的前言和结语中，颇有些新奇的看法。

文艺是文化的集中表现，用文艺取代文化是西方学者惯常的做法。这种文化研究，让人想起“挂羊头，卖狗肉”。之所以挂羊头，可能是因为文化听起来“高大上”。之所以卖狗肉，恐怕是因为文化门类繁多，内容复杂深奥，不如拿中国的电影戏剧小说做文章便捷。仅此一条，就可以看出，西方对文革文化的研究，远不如对文革政治的研究。康浩批评马若德、沈迈克的《毛最后的革命》只讲中南海里的政治，不讲老百姓的生活。可是这本书中所谓的老百姓的生活，不过是另一个“羊头狗肉店”罢了。

文革文化是红色文化的登峰造极，作为红色文化研究的一家之言，康浩的“羊头狗肉店”生意兴隆——把毛时代的电影戏剧小说当文化说事的，这些年不在少数。这种以文艺代替文化的情况直到留学欧美的大陆学者有了话语权，才有所改观。本刊243期发表的哈佛李洁、斯坦福李海燕关于“红色遗产”的文章，多多少少为西方学界争回了点面子，让人们知道，大洋彼岸也有挂羊头，买羊肉的主。

为了让国内学界对西方的“红色文化”研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邀请法国的度关山博士翻译此书，啟之先生审校。遗憾的是，本刊虽多方联系康浩先生，希望他能审阅译文，并与出版社一道授权本刊发表，但各种努力均无功而返。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本刊只能以介绍的方式呈现此书的内容。同时，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一家之言的影响，我们配发了宫宏宇先生为此书写的书评。

讨论红色文化，语言（词汇）、修辞与文风、文体是重要的一环。国内学界只是就语言说语言，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到文化里，与生活习惯、精神世界联系起来，其深度和意义受到了大局限。这一期发表的乌扎拉的《红语：毛泽东时代的语言》一文，只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意在唤起大家的关注。以后我们还要刊发这类的文章，并配发现代汉语学者刁晏斌的关于文革语言的专著。

【红色文化研究】

“红语”：毛泽东时代的语言

烏紫拉

一 “红语”：变化的汉语

革命能改天换地，却改不了语言。“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三年零九个月，“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消灭了三分之一人口，就是没法消灭高棉语。

革命改不了语言，却能改词汇，改文风。法国大革命时，贵族语言跟着老爷夫人小姐一起流亡国外。平民语言、菜市大妈的语言，粗鲁粗野粗鄙的语言当家做了主人，占据了大大小小的报刊和高高低低的话剧舞台。可是，“经过了当权的资产阶级清洗过的法国语言，仍然不可能恢复1789年以前的面目。革命在法国语言上烙下深深的印痕。”¹

中共重整河山，一统思想，语言首当其冲。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章告诉国人：“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毛与鲁的著作“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他们“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毛为语言的使用制定了正确的原则，鲁迅则是“实现这些原则的模范”。

这篇社论所说的语言，主要指的是词汇和修辞。“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不是说创造一种新汉语，而是说，第一，要去旧迎新，第二，要有规矩方圆。语言的背后是思想文化，要让它们去旧迎新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经过十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到了1966年，去旧迎新才有了些许本钱。这一年的2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文件诞生。此文件有一个很长很啰嗦的名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

¹ 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页73，罗大冈译，商务印书馆，1985。

要》，此文是经过毛多次修改，江青亲自审定的。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这一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纲领，它不仅开创了革命新文艺，而且开创了毛时代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首先表现在红色语言和红色语体上面。为了简便，我称它们为“红语”。“红语”不是另一种汉语，它是词汇、修辞、文风、语体上发生了或大或小变化的现代汉语。它产生于文革，为文革服务。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提到过大洋国“真理部”创造的“新话”。我们只知道这是一种通过不断地减少词汇而形成的语言，具体是什么样子，作者并没有说。我的“红语”比他的“新话”要具体得多。我将告诉人们，“红语”的词汇有哪些特色，“红语”在修辞上有哪些不同，“红语”在文体上有哪些贡献。

二 “红语”词汇之构成

“红语”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在词汇上。它的词汇由政治、军事/战争、粗口三大块组成。政治运动频仍，每个运动都产生大量的政治词汇。政治词汇在口头书面渐占优势。政治需要枪杆子撑腰，所以军事/战争词语摇着小红书紧随其后。粗口忝列其中，原因如下：

第一，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工农化，从四十年代的“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后来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以贯之。工农兵乃粗口之渊薮，脏话之大本营。

第二，国家的管理者大都来自这个大本营，他们借助政权之威，革命之义，将其习惯的语言灌输给社会，以粗野为美遂蔚然成风。东北干部说话必带鸡巴、屌，西北干部言必称毬，四川干部张口闭口龟儿子，江浙干部离不开娘希匹，“他妈的”则通行全国。

文革前，粗话上书面的机会不多。作为革命的象征，它们只是出没在口头上，潜伏在意识里。到了文革，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滚他妈的蛋”写进了大字报，北京的小女生为加入红小兵而苦练“操你妈”，毛诗词里的“不须放屁”被谱了曲，传唱全国。这些都是工农文化长期浸润之果，绝非革命造反一日之功。

三 “红语”词汇的来源

“红语”是个大家族，词多势众。但在语言学上，它却搞不了特权，跟《语言学概论》中的词汇一样，这个家族也有基本词和一般词之分，也有通用词和专用词之别，也有外来语和固有语之异，它的基本词汇也具备全民常用性，历史稳固性，构词能力强等特点¹。

“红语”基本词的来源有二，一来自苏俄，一来自本土。外来者以马列主义的词语构建，本土者以建党建军的之词语组成。这两种基本词，就仿佛是两条强大坚韧的树根，深扎于岩隙石缝之中，虽曾低萎槁悴，生意几尽，但经井冈徙植，遵义移根。终获地利得天时。于是开花延河之滨，结实明代之都。及至文革，赫赫然根节盘魄，主干崔嵬，枝叶葳蕤，山崖表里，华盖遮天，俨然南伯子惊叹的“此必有异材”的商丘之木。这木的两条根，也就成了“红语”的奠基，为党史所必写，课程所必设，学生所必修，升学所必考。

“红语”一般词是这商丘之木的枝叶，它们多由政治运动之词叠加积聚而成。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评红楼梦、批胡适、工商业改造、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反右倾、三年困难、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学雷锋、学解放军、文艺整风……。

经过多年的积蓄和培养，“红语”掌控了大量的基本词和一般词，有了称霸口头书面

¹ 参见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第四章，中华书局，1963年。刘伶、黄智显、陈秀珠主编：《语言学概要》，第四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的资本。文革一来，“红语”抓住机会，闪亮登场。与此同时，它也为“红语”词库贡献了大量枝叶性词汇：三家村黑店、红卫兵、造反派、资反路线、夺权、喷气式、文斗、武斗、砸烂狗头、油炸猪头、王关戚、小爬虫、新鲜血液、上山下乡、可教子女、三支两军、批林批孔、五七干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斗二批三改、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 “红语”词汇的特点

“红语”之新在词汇，首先，它搞了一个“破旧”：禁用封资修词汇，禁用私人性词汇，爱情、亲情、乡情统统扔掉，换成阶级情、党国情、领袖情；禁用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的词汇，似乎、可能、好像、也许、大概一律下岗，换上一定、必须、真正、不折不扣等明确坚定之语。“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第一，大量地征用副词，如：最、极、极其、极为、更、更加等，赋予某些副词，比如“最”，新的语义功能，打破语法的限制。

第二，大量地招聘形容词，如：大、新、一小撮、无限、无比、一定、必须、真正等。让它们在讲话、文章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话语权。

第三，大量使用引用语。毛的语录、诗词成为所有文章不可或缺的构件。

第四，大量使用短语/词组（三字、四字、多字，如英雄的豪言壮语和被加工过的“闪光的语言”）等被政治化的惯用语。让它们成为讲话作文的固定成分，从而使天下文章都变成一个模样。

五 “红语”昌盛，新人辈出

商丘之木，天下异材。此树一出，众木萎顿。“红语”昌盛，它语凋零。想当年，八亿国人都挤在一条道上。张口基本词，闭口一般词，除此之外，别的不知。不是不想知，而是无从知。看如今，熟稔“红语”的，可以戴上博士帽。为“红语”加注解写说明，就可以当教授博导。他们不会为词义之真伪烦恼，只会为绿肥红瘦操心。

2013-8-3 修改

【红色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Paul Clark,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部教授。七十年代中期, 作为新西兰三名交换学生之一, 他来到北京学习了两年。八十年代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语言专业博士学位后, 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从事中国电影研究, 期间参与策划夏威夷国际电影节。1990年代至今, 任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中国电影、文革文化、大众文化。

主要著作：

《中国电影 1949 以来的文化与政治》*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再造中国：第五代导演与他们的电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香港中文大学, 2005)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国的青年文化：从红卫兵到网民》*Youth Culture in China: From Red Guards to Netiz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联合主编 (保罗、彭丽君、蔡灿煌)

《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帕尔格雷夫,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Palgrave Macmillan) 2015-11-10

《一场文化的革命》内容详介

——康浩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前言

度關山 啟之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给文革定了性——它是毛泽东个人妄念的产物，是一场社会大动荡。同时，作者对后毛时代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好评——

在世界历史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规模最大的、非战时的、集中性的社会动荡。这场浩劫从1966年持续至1976年，见证了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如何对一个人的妄念做出明显地回应。毛泽东号召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复兴他的革命，使得中国不至于陷入他所看到的、在苏联发生的、修正主义和自鸣得意的风险之中。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才能流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但是，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就结束了。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被毛泽东所反对的经济政策所改变。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已经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在现代世界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加。

接下来，作者表示了对西方文革研究界的强烈不满——直至文革四十周年，人们还是在老地方——高层政治上转圈子。他批评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作者——美国哈佛的马若德和瑞典隆德大学的沈迈克。认为他们的煌煌大著，讲的全是中南海里的事，对期间的文化（其实是文艺）一句也不提，实在是个大缺点：

2006年，为了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以及结束30周年，关于这些事件的大量新史书在美国出版。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也译为“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认为：“为了理解当今中国社会

的‘为什么’，人们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是什么’。”在将近 700 页的篇幅中，他们记录了这场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背后的权威性洞察事件。马若德和沈迈克使用了一系列材料，包括文革十年的出版物，以及回忆录和其它出版的记录，对最高层次的政治派系进行了法医式的剖析，正是这些高层政治博弈推动了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毛泽东最后的一项重大举措的后果之中。大多数叙事集中在中国政治的最高层，即位于北京中心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内的领导层。

这项重要的研究所缺失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层面。事实上，马若德和沈迈克从未直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的运动会被称为“文化革命”。他们仅仅是暗示毛泽东认为他的继续革命需要文化的转型，而不仅仅是政治保证。在他们的书中，文化生产与消费基本上没有出现。偶尔提到的京剧、电影或者芭蕾，也总是在顶层政治争端的语境之下。这两位作者很少超越共产党政治的话题来讨论文革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意义，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不得不对一个不断贬低人民的北京领导层通过种种仪式表达忠诚。

不破不立，上边是破，下面是立。这本书就是要摆脱传统的研究模式，就是要纠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误导，就是要用“尊重艺术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技能的方法”把人们对文革文化的贬低和误解中解放出来。而这些都包括在他写这本书的三个目的之中——

这本书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书写一段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史；其次，提供文革期间的、超越政治或者社会精英阶层之外的、更多的日常生活的见解；最后，将这十年的历史更加牢固地安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之中。对文化的关注，而不是对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的关注，能够为后两个目的提供更多便利。

此前，从没有人试图书写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综合性的文化史。使用中文和西方语言写的，关于戏剧、文学、艺术和音乐的研究为 1966 年至 1976 年期间的这些特殊活动提供了相当深刻的见解，虽然最常见的情况是，讨论被放置在更广泛的、1949 年后或者 20

世纪发展史的背景之下。通常的做法是，将这十年视为一段有限的、充斥着扭曲的运动的时期。很多中国人，在被问及这些年间的文化时，会半开玩笑似地表示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老话常说的一句笑谈“八亿人看八个戏”经常被认为是对这十年期间的文化生活的充分总结。在本书中，我们借鉴了毛泽东逝世之后三十年间出现的当代资料、回忆录和学术研究，并且采取了一种试图尊重艺术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技能的方法，试图表明那句老话常说的笑谈是多么具有误导性。毛泽东政治的疯狂可以解释这些年间大部分文化实践的愚蠢和虚妄。我们将看到，政治领导人们如何不断地忧虑着他们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控制。但是，与开始能够被掌握的、在政治层面的集中关注相比，这十年还有更多的持续影响。

作者上面说，他写此书的第一个目的，是写一部文革文化史。为了写这种历史，他“使用了一种汇集了各种文化实践的方法，从戏曲和舞蹈到写作、阅读、艺术，甚至建筑，都展示了这些年间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互联性。样板戏主角的生活超越了京剧院，他们活在海报之上，活在新生的民间舞蹈中，活在故事中和漫画书里，甚至在日常的家用器具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种重复的存在说明了文化当局对发明新的大众文化的野心。这些英雄的无处不在，也提醒我们关注观众对这些新的文化产品的反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两种反应是显而易见的：对这种英雄主义的内化和围绕着它的修辞，或者以更加令人满足的、情感及个人的方式、对这种英雄主义的秘密讽刺或者精心阐述的反叙事。”

对于文革后出现的大量的回忆录，作者以1991年在英伦出版的张戎的《野天鹅：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为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书竞相呈现了苦难、迫害和顽强生存的故事。西方读者不禁被这些故事所感动，尽管几乎没有读者能够评估在这些家族故事讲述者背后存在的利益问题。这些回忆录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作品，他们相关的、社会与政治影响的地位受到红卫兵的威胁，而红卫兵是毛泽东在他最后一次革命中的、年轻的冲击性力量。这些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往

往是对社会地位、以及作者眼中的政治正当性的重新声明的一部分，即使作者们不承认这一点。

在批评了回忆录之后，作者提出了如何理解文革文化的办法——通过对文革文化实践的描述，来理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戏曲、舞蹈、电影和美术的生产能够让我们超越政治精英，而遇见一系列试图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专家们。在中国观众的世界中，文化消费可以让我们看到普通中国人的种种娱乐和世界观，其中包括的当然不止八个“样板戏”。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图景，毕竟文化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核心。

作者对文化消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不管在多么专制，多么独裁的统治下生产出来的文艺作品，观众和读者都可以有自主权——

了解观众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生产的反应是一项挑战。艺术家和管理者在表现官方认可的作品时努力做到“思想正确”，大众对此很欣赏。而围绕着这些作品的讨论，则把大众的欣赏解读为英雄主义。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在他那本出色的《党与附庸风雅者》（*The Party and the Arts in China: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中，提醒我们注意观众具有自主权的可能性。自从 1980 年以来，克劳斯就专注于艺术与文学的商业商品化，他认为，观众和读者能够与艺术和文学作品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

用接受理论的说法，不管“受众控制”（audience control）得多么严，“受众自治”（audience autonomy）仍会存在。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文革中的“受众自治”：

在本书中，我们认同这种关于中国观众的观点，甚至将其应用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最强烈的时期。虽然文革最后两年我在北京生活所看到的这种“受众自治”（audience autonomy）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我本人听说的闲闻轶事。但有的时候，在媒体发表的报道的背后，还是可以看出观众对文艺作品的实际反映。比如有的报道批判了一些“落后”剧团表演了“黑色”节目，其实正是这种“落后”的存在，才吸引了观众。一般来说，官方对某部新作品赞美得越热烈，意味着他们越缺乏自信，而不相信观众们也会接受官方的立场。

看到样板戏的英雄形象无处不在，作者不禁想到了商业，想到市场——只有需求才会有供应。既然搪瓷缸子、铅笔盒上都印上了杨子荣、方海珍、吴清华的像，而人们又踊跃购买，那么就说明社会有需求。这些形象就成了商品，于是，作者萌生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商品化（ideological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作者又进一步提出，文革使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文化走向了市场，成了商品。商品化给作者巨大的启示，他由此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种商品化为文革后的文化商业商品化（commercial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开辟了道路。文革非但没有使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发生断裂，反而成了承前启后的桥梁——

关于观众的另一个信息来源，存在于中国人在1978年之后的新的文化市场的回应方式之中。我认为，尽管政治环境差异很大，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克劳斯所讨论的，1980年代对六七十年代的回应、期望和兴趣。事实上，文化的商品化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艺术生活的特征，正是文革中文化的意识形态商品化，使得这种文化商品化成为了可能。在那十年中，样板作品不断地重复再演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是跨类型产品的搭配销售。样板戏中的英雄会出现在海报上、歌曲中、漫画书中，甚至出现在铅笔盒和搪瓷杯上。这种商品化使得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文化市场的崛起似乎不再是一种与过去的断裂——而

以往人们总是这样假设。

至此，作者给他的文化研究做一个并不算夸张的总结：虽说文革对文化造成了破坏，但也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并且有着不同凡响的创新。这种创造力和创新并不是从文革中产生的，而是以原先的文化为基础。那些批评文革文化（其实是文艺）的人，把文革从中国近代百年史中孤立出来，认为文革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是错误的。疯狂既不妨碍对原来文化的继承，也不妨碍文化的商品化，反而减少了改革开放的阻碍——

文化研究为理解文革的历史、性质和影响，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富有成效的方式。“样板戏”电影和芭蕾舞剧照，对于感兴趣文革的人们来说，是集体视觉记忆的一部分。对于文革文化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从两个方面理解这场革命，而这种理解往往与通常的阐释相反。首先，在这十年中，文化领域的创新与实验与主流史家所强调的破坏与失败形成了对峙。其次，文化视角能够让人们对文革前后的两个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非官方的角度来看，文革都不仅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焕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十年。它以既有的文化为基础，为1980年代开始的文化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的第三个总体目标是展示文化大革命如何在其更广泛的20世纪背景下得到最好的理解。那些极力渲染文革期间的艺术过度化和局限性的人们，以及书写回忆录意图“纠正错误”的人们，都倾向于强调文化大革命与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之间的脱节。正如马若德和沈迈克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最后一次革命的疯狂确实证明了他的政治的破产，并且使得在他死后做出改变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作者认为，文革虽然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发疯，但从历史上看，却是合乎逻辑的正常发展。他把文革十年放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里，于是就有了一个发现：与清末的维新变法，民初的五四运动，马列主义的引入，延安的社会动员一样，文化大革命仍旧是中国的政治

精英们试图摆脱贫困落后，赶超先进国家的艰卓努力的一部分——

在我的研究中，文革十年并不是被视作一段失常期，而是被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发展的某些趋势的背景下。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文化实践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经验之中，不仅仅是在1949年之后的经验，而是自从19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权力与文化碰撞之后的经验。随着中国在东亚的绝对权威的陷落所产生的新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以及加入西方国家的日本国的崛起，一种深刻的不确定性弥漫在中国的回应之中。让中国再次变得富裕和强大的迫切需求与中国文化遗产价值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清帝国的最后几十年里，社会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在面对现代化困境时取得的成功启发，已经开始产生了让国家变得更强大的新想法、新媒体、甚至新式学校。清王朝引进了新式教育和新的思想，但为时已晚，中国的帝制时代在1911年结束了。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国的当权派试图为新生的共和国指定有效的政治结构时，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参与有关前进方向的新思路。面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矛盾心理依然存在，尽管五四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完全拒绝过去。¹1919年5月4日，学生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们在中国各个城市示威抗议军阀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的让步。示威日期为当下试图让中国变得“富强”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名称。更为激进的“五四分子”呼吁彻底放弃中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价值观，并且以外国的道德和组织社会的方式取而代之。在呼吁激进变革的倡导者们之中，就有后来在1921年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一群人。一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其列宁主义的传承中，将为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

在快速地梳理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之后，作者又回顾了近百年中国的文化变迁：从五四

¹ 19世纪末期西方政治思想领域的翻译家严复，就是这种对西方持有矛盾态度的典型代表；参见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世界》（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64。

提出的白话文，到话剧、电影等西方艺术的引入；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民间传统结合起来，要为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20 世纪上半叶的五四时期是文学和艺术创新的时期。一种用类似日常用语的“白话文”写成的新文学，对社会改革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甚至更通俗的写作也得到了支持。在中国音乐戏曲现代化的努力背后也存在着一种对改革的迫切需求，戏曲艺术家们试图将新引进的话剧与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电影，尤其是在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上海，主要被掌握在进步艺术家手中，他们看到了媒体在大众中的影响，试图以电影推动变革。

正如 1895 年的中日战争成为了王朝改革和最终崩溃的催化剂，1930 年代至 1945 年的抗日战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8 年之后，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民族团结的国民党政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揭露出其软弱和腐败的一面。与此同时，在其战时指挥部——延安的共产党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农民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及改变农村和城镇的社会权力。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动员的思想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相结合。毛泽东与党的思想家们为回归城市著书立说，制订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重新确立文学和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启蒙、提升和统一对世界的普遍理解。在这个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外来的概念与本土的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混合物，以满足中国（以及中共）自己的目的。来自北京和上海等地的西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得不探索如何使用流行的或者大众的文化来实现新的、革命的目的。这些政策首先在延安和其它共产党的根据地实施，1949 年之后推向全国。

根据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把握，作者指出，文化与政治不同，政权可以一朝瓦解，文化则会绵延下去。政治可以一刀切，文化不行。两者不同步——

根据重要事件（例如，1911 年清政府的崩溃，1937 年日本的侵略，以及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来划分年代,是思考和书写20世纪中国的常见范式。然而,文化视角使人怀疑这些日期的重要性。1915年之后,“五四”作家们发表在《新青年》之上的、典型的文学风格的变化,起源于1890年代和王朝崩溃之前出现的、现代主题的新式小说。对于20世纪中叶的艺术和文学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日本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占领,而是毛泽东在1942年的春天,在延安发表的关于文化实践的政策。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在他们1997年所写的、关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综合概述中,提出了一个更有用的分期,认可了更深层次的变迁,而不仅仅是政治变革。他们提出了三个主要时期:1900年至1937年的“迈向新文化”,1938年至1965年的“回归传统”,以及1966年至1989年的“现代性的重新定位”。正如每个时期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1949年的政治分割的重要性大幅度缩小,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的大众和精英的联系的努力成为焦点。¹2000年,唐小兵对上世纪文化类似的回顾,确定了其文学和艺术的连贯性和整体性。²

第一个史无前例的、不使用标准的文革大革命十年分期的做法出现在2005年,在一本长达600页的、关于中国自从1949年以来的舞蹈年表之中。茅慧和编辑团队的其他成员以1965年和1975年为关键时间点,对于一本中国出版物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³对于一本中文书来说,这一步骤是如此的大胆,以至于编辑们选择不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年表的内容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文化实践这一领域的变迁并不依赖于政治年表。

因此,作者认为,文革十年的文化分期与政治不同。他把文革文化史分成三个时期:1966-1968是初期,1969--1971是中期,余下的几年是晚期——

本书将用若干个章节说明1966年之后,十年中的文化活动与政策可以分为三个广泛的

¹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与雷金庆(Kam Louie),《二十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

² 唐小兵,《现代中国:英雄与日常》(Chinese Modern: 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en),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重点见第341-348页。

³ 茅慧编著,《新中国舞蹈事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阶段。初始时期（1966-1968）以城市社会动荡，红卫兵激进主义以及对毛泽东的崇拜为特征。第二个时期与人民解放军有关，1969年，解放军帮助恢复了秩序，1971年，解放军失去了总司令，这一年毛泽东选择的继承人林彪从权力顶端坠落（同时从蒙古国的天空中坠落，在涉嫌谋杀毛泽东失败后逃亡的路上）。在第二阶段，数百万的前红卫兵和其它青年被送到农村“下乡”。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一定程度上的常规回归到中国文化甚至政治生活之中。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期刊的出版，新式电影，以及表演和文学类型的扩张，经历了显著的扩大化。

直到文章的最后，作者才透露消息，他这本书关注的只是文革的“文化生产和消费”。而对于这一领域，作者有独到的见解——文革折腾的是政治，文化非但没有被折腾，反而在这十年中有了惊人的创新，它承前启后，继续在朝着现代化前进——

在本书中，我将展示1966年之后的十年内，在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领域，甚至在延安时期之前，这些活动是如何努力将中西方的传统和元素在新的文化实践中相结合的。在文革中的八个所谓样板戏包括深深根植于中国流行文化的现代化音乐剧、两部重新加工的西方古典风格的芭蕾舞剧、以及一部以现代风格戏剧为基础的交响乐作品，这并不是一种巧合。我将试图说明，中国虽然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是，它对文化现代化的传承并没有中断。而文革则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延续、深化，甚或扭曲了这种传承。我认为，文革中的艺术家和领导者，就像在去八十多年间他们的同行们一样，痴迷于文化的现代化。

在审视20世纪的文化连续性的时候，米里亚姆·汉森（Miriam Hansen）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汉森关于美国和其它国家电影的写作被张真应用到对从1890年代的“影子剧”到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文化的分析之上。张真确定了大众（或者白话）对现代性的回应，通过电影在中国城市，尤其是上海得到了反映和增强。“白话现代主义”为政治和社会领袖的精英主义野心提供了另类的、或

者反体制的话语。¹但是无论汉森还是张真都没有将这个概念应用到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之上。通过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实验是一种注定要在现代项目中将白话和精英结合起来的尝试。在指导大众文化话语时，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们不可能比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和政治领导者们更成功。

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中论述的，将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独立出来使之流行的倡议，与1937年以前的白话现代主义经验相吻合。在本书中，我们将强调精英和良好教养者的野心与大众的回应和抵抗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提醒我们注意观众和艺术家的三个领域：一、真正大众的，二、良好教养的，三、中间领域。学识渊博的作家们从中借鉴并且促进了本质上是白话形式的详细阐述。正如帕特里克·汉南（Patrick Hanan）和其它学者在对20世纪前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研究中所提到的，精英作家们可以欣赏甚至创造那些深刻根植于白话的、流行的传统中的作品。²这三种类型的观众与杜博妮在她出色的论文集《虚构的作者，想象的观众》中提到的“读者地形学”有所不同。杜博妮拆解了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小说只有单一受众群体的虚幻印象，将其分成4大组。主要读者群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组成。次要受众由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僚构成，另外两个群体则是在海外（汉学家、华侨，以及一般读者）。³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表演艺术和美术的观众的考察证实了杜博妮论述的前两类受众的重要性。在这十年之中，次要受众在塑造文化方面最有力和最野心勃勃。他们试图将主要受众扩大到包括来自更广泛的、受过教育的和世代背景的人，而且看上去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文化大革命的艺术和文学试图拥抱和发扬大众性、教育性和现代性。

在中国追求富强和谋求影响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段弯路，而是发挥着


¹ 张真，《银幕情史：上海电影（1896-1937）》（An Amorous History of the Silver Screen: Shanghai Cinema, 1896-1937），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

² 帕特里克·汉南（Patrick Hanan），《李渔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Li Yu），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另见他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小说：随笔集》（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say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

³ 《虚构的作者，想象的观众：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Fictional Authors, Imaginary Audienc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重点见第5-6页和第46-47页。

重要的正面作用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强大主题，包括群众动员和重新推动中西方元素在一种新型大众文化中相结合，与几十年前的痴迷相一致。1966年至1976年之间，一些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不应该掩盖文革前后几十年的长期连续性。文革不仅仅被视为是一段破坏性的时期、或者政治派系冲突的舞台，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性创新的时期，以及对改变中国文化遗产的真正努力。更新停留在艺术家或者观众们的常规惯例之中的文化形式的、失败的或者三心二意的意图，让位于对现代主题形式和价值观的全面转变。这些努力的最终失败，或者对其荒谬政策的拒绝，并不会减损它们的惊人创新性和所代表的承诺。这些动荡的参与者们继续抓住了1970年代之后的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即使在1980年代的艺术和写作中，文化大革命文化的野心依然在回荡，而这些书写看似是完全否定毛主义的文化。

在前言的最后，作者介绍了此书诸章的内容——

第一章讨论了京剧现代戏中的文革创新的起源。我们将展示这些新式京剧是如何成为一群现代专家与表演者们合作数十年经验的产物。第二章探讨了这些新式戏曲和芭蕾成为新的大众文化样板的方式，包括所谓的将京剧移植到其他地方音乐戏曲之中。第三章主要关注的是电影，因为正是在电影之中，英雄模范们和他们的创新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第四章讨论了1970年代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化生产的扩张，包括对舞蹈、音乐、其他舞台作品、美术和建筑的普及化和现代化。第五章考察了写作和阅读，同样还讨论了观众、艺术家和一些政客们对过度政治干预的反应。结论部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现代性方式使得1980年代及以后的进一步实验成为了可能。

附：书评

不仅仅只是“红宝书、样板戏、语录歌

——康浩（Paul Clark）著《文革文化史》述评

宫宏宇

只要是研究当代中国，文革都将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由于文革在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重要性，有关文革的课题在海外一直倍受学者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有所谓的“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之说。¹除专门的研究外，文革作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有的、轰动世界的现象，对国外的普通学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研究文革的世界头号权威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80年代中在哈佛首次开设有关文革大课时，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竟有上千名之众。之后多年，这门课与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最近刚刚结束的中国近代史共同课一样，一直是哈佛最“叫座”的课程之一。

关于文革的各类出版物在海外更是应有尽有，除大量有关文革的资料汇编外，历年所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也汗牛充栋。但众多的研究几乎都是从国家政治这一层面来诠释文革时中国的政治斗争。如马若德早些年所著的权威性的3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他与费正清一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以及2006年出版的他和另一位文革研究专家瑞典隆德大学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所著的长达近700页的《毛最后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书，都注重对文革共产党中央领导阶层间的政治斗争的研究。对文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只是作为派系斗争的脚注稍稍涉及。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刚刚出版的，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康浩教授（Paul Clark）所著的《文革文化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是近年来唯一的一部以文革中文化艺术为主题的专著。

¹ 近年来，由于宋永毅、徐友渔、王友琴等海内外一批学者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以及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的重要基地的作用，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也开始占居重要地位。

国内音乐界的人士知道康浩的人可能不会很多，但对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海内外学者来说，他却绝不应该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中国电影研究还不时髦时，他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不夸张地说，他是海内外最早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元老级学者之一。他在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专业读博士学位时，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电影。博士学位完成后，他曾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方研究中心”从事中国电影研究工作，并参与策划夏威夷国际电影节。1990年代初，他的母校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特邀他回校任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一职。由于治学严谨，不盲从时髦理论，不随意发表文章，康浩有关中国电影的著述在学界口碑极好，常常被学者引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他在哈佛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Chinese Cinema: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ce 1949*）一书，可以说是最早研究新中国电影的专著，已成为研究新中国电影的经典著作。此书自出版后20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学者所必须参考的，国外的大学只要开设中国电影的课程，就一定会把它定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他的有关于中国电影和通俗文化的论文在数量上虽然不是很多，但大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电影中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的论文）。¹他的近作《再创中华：一代人及他们的电影》（*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200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深受同行及读者的好评。²

康浩也是海外较早从事文革中文化艺术发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着手写他的《文革文化史》一书时，正好是笔者随他攻读博士之日。对于他的这一研究项目，笔者起初是不以为然的。原因除笔者当时还没有挣脱“文革无文化”之说的影响外，还不免对他能否有厘清文革文艺界复杂内幕的能力有些怀疑。因为研究电影以外的音乐、舞蹈、话剧、曲艺等其他表演艺术毕竟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所以他的《文革文化史》面世后，笔者所做的第

¹ 参见 Pau I Clark,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ese Films: Cinema and the Exotic*, East - West Film Journal, Vol. 1, No. 2 (1987), pp. 15-31.

² 可参见 Mingwei Song 刊载在美国夏威夷大学2006年春季《中国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13, No. 1, pp. 99-103）和 Jonathan Noble 刊载在200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 No. 58, pp. 245-48）上的有关书评。

一件事就是详阅样板戏、语录歌、红卫兵歌曲、文革期间的器乐曲等与音乐有关的章节。结果不仅对他书中所论述内容之详尽非常满意，更对他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的叙述方式深感钦佩。

《文革文化史》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涵盖面之广，文革期间的文化事象，如样板戏、革命芭蕾舞剧、前期的红卫兵歌曲、语录歌、中后期的器乐曲、中小型舞蹈作品、《战地新歌》中的歌曲、话剧、曲艺、电影、官方审定出版的小说诗歌、民间流传的手抄本、知青地下文学、美术、建筑等等，都在其讨论之中。

本书除前言 10 页和结论 14 页外，共有正文五章，加参考书目和索引一共 352 页。此外，还有照片宣传画 15 张。第一章以追溯文革文化的主导形式——革命样板戏的起源为主，兼及 20 世纪京剧的改革与创新。通过人物采访与检索大量的原始资料，康浩清晰地叙述了样板戏的肇始过程、出台内幕、江青插手的经过和编演人员的变迁。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后来被江青据为己有的样板戏，其艺术上的创新在文革开始前已完成。样板戏不仅是多年来有关专业创作人员与演员合作辛勤实践努力创新的结果，也是左翼文艺、延安艺术及十七年文艺发展的自然延续。第二章论述样板戏(包括芭蕾舞剧)是通过何种机制与渠道，以何种方式而成为新的大众文艺的样板的，其中也用了部分章节讨论样板戏的移植。第三章虽然论述的是文革中的电影，但仍与样板戏有关，特别是其中的第三节重点陈述电影在传播样板戏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叙述样板戏电影的出台内幕拍摄及发行过程(包括生产适合边远地区放映的电影放映机和 16 厘米胶片等)，康浩告诉读者没有电影这种现代传播媒介，样板戏就不会在中国有那样广泛的流传。第四章讨论文革期间的舞蹈和 1970 年代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其中第一节以 1967 年江青认可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为主，兼及 1970- 1976 年间全国各地出现的其他歌舞剧和小型舞蹈作品。这里不仅涉及到《沂蒙颂》、《铁道小卫士》、《草原儿女》等广为人知的作品，还提到《喜送粮》、《战马嘶鸣》、《野营大军进山来》等多部中小型舞蹈。第四章第二节最值得注意，这节重点讨论文革中的交响乐和各类器乐

曲，除了谈到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白毛女组曲》等作品及其创作背景外，还涉及到文革中后期的改编器乐曲热潮。

康浩认为文革期间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有了引人注目的转变，具体的体现是：外来的交响乐和适合精英人士趣味的古典音乐在文革中经历了进一步的通俗化（或华化）过程；而植根于本土传统的、民众积极参与的民族民间音乐却被进一步的现代化（或西化）。他注意到，文革中虽然提倡民族化，但其间所创作出的音乐却体现出更强的西化倾向。特别是在乐器的选择、和声的配置、音响效果的追求、创作体裁（交响、合唱、重奏、齐奏等）的选择等方面，西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到文革晚期时，甚至连数度遭抨击的无标题音乐（如陈铭志的《复调小品 11 首》、陈钢的《G 大调小提琴协奏》等）也开始出现。他还注意到，文革初期中国本土的民族民间音乐并没有得到重视，但少数民族音乐却例外。他用了很多具体的例证表明，与汉族音乐相比，少数民族音乐无论在选题上或表演上都有较大的自由空间。除专业创作外，本章还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等业余爱好者创作的有影响力的通俗歌曲、文革时期的话剧和曲艺、美术作品和建筑等有所论述。对红卫兵时期的艺术活动，如漫画、小分队演出节目等也有涉及，但都不是很详细。

同样，第五章在论述文革中的官方的和地下的文学创作，包括“手抄本”小说时，也给人以匆匆带过的印象。笔者曾就此缺陷问过他，他说《文革文化史》的主旨是概述文革时的文化，红卫兵时期的艺术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详尽讨论将在其正在写作的另一部专论文革时青年文化的书中重点论及。康浩写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条理清晰、用词简洁、可读性强。这一点就连对他的《中国电影：1949 年后的文化与政治》一书批评多于赞赏的詹纳尔（W. J. F. Jenner）也不得不承认。康浩不似目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喜欢卖弄时髦理论，故意把简单的道理弄得玄而又玄。《文革文化史》一书也不例外，文革十年的文化和政治错综复杂，牵涉的人和事多不说，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极为复杂。但康浩对文革中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和相关脉络在此书中都有清晰地疏理和陈述。康浩在引言中明确说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三：一是提供文革时期的文化史；二是对文革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和

精英阶层之外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洞见力 (insight) ; 三是把文革十年牢固地放置在 20 世纪的大语境中来分析, 而不是把这十年当作一个断层, 把它分裂开来单独的看待。看完全书, 我觉得他确实做到了他所要做的。他笔下的文革时期不再是一幅单色调的、枯燥无味的“文化沙漠”图, 而是一幅多色彩的、浓淡有致的画面。在他用诸多具体事例绘制的图画中, 我们所看到的文革艺术不只是政治符码, 而是艺术工作者如何在极端政治高压下, 利用有限的自由创作空间创作出可以为后人所欣赏的、在方法上不乏创新的、有独特艺术特点的作品。通过对文革中公开发表的和地下文学的讨论, 我们看到老百姓所体验到的文革文化不仅仅是“红宝书、样板戏、忠字舞、语录歌”, 或浩然创作的、以无产阶级为题的、主人公都千篇一律“高、大、全”的御用小说, 也有《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描述知识分子爱情和谍报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 通过把样板戏置身于 20 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史的大语境来观测, 康浩不仅揭示出样板戏是如何在继承、扬弃、吸收、改造的矛盾中建立了改良戏剧的典范, 还令人信服的阐明了它与 20 世纪初即开始的旧剧改良, 特别与其前身——革命现代京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

遗憾的是, 在论述文革文化与 20 世纪大众文化的关系时, 他没有参考台湾学者李孝悌的有关论著, 特别是李于 1996 年提交给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戏曲、社会与政治: 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1901—1937》。因为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李孝悌对上海的改良戏曲及“海派京剧”有很详尽的讨论。¹李孝悌的研究表明, 当时的改良京剧不仅在内容上有社会改革剧、政治剧、荒诞剧、历史剧, 在舞台设计、布景配置、演出形式等方面也有了我们一般认为是 20 世纪中期才有的新的突破。如早在 1900 年代, 上海就以圆形的新舞台取代了传统的正方形舞台, 引进了可以用机关控制的旋转舞台。除了现代的灯光和舞台设计外, 还采用了写实的布景等现实主义再现手法、用了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伴奏 (比文革

¹ 可参见 M ingw ei S ong 刊载在美国夏威夷大学 2006 年春季《中国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 13, No. 1, pp. 99 - 103) 和 Jonathan Noble 刊载在 2007 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 No. 58, pp. 245- 48) 上的有关书评。

时的样板戏早了半个多世纪)。¹另外还有的一点不足的是,康浩并未就革命样板戏与1930年代的“主题先行论”和1940年代的“旧剧改革论”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进行明确的厘清。即使如此,他把文革间的文化发展置于20世纪的大语境的这种取向还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与当前的研究总体趋向同步的。澳大利亚学者 Trevor T. Hay 甚至把样板戏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贡献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焦点之一。²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综述文章中,惠雁冰也指出,“侧重从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包括文革时期特定的政治斗争来阐释样板戏出现的历史动因与建构过程”,“忽视样板戏与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解放区文学,尤其是与最切近的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关系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缺失之一。(惠雁冰:《样板戏研究亟待整体性的学术视野——对当前样板戏研究倾向的理性审视》,《二十一世纪》,2008/2)康浩擅长叙述、以简驭繁,其功力在于他的史学训练和他对新中国文化史的熟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康浩出生在新西兰的一座海滨城市。在奥克兰大学历史系读硕士时,他就有关于新西兰毛利族群性认同的专书问世。³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后不久,康浩即于1974年以中新交换学生身份来到北京,1975年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198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他师从有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祭酒”之称的美国研究中国学大宗师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严格的史学训练和他在北大时对文革的亲身经历让他拥有了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优势。此外,他一直从事的中国电影研究和他对文革后脱颖而出的新第五代中国电影人的熟悉,无疑有助于他研究文革其他文化事像和美学事象。在谈到5文革文化史6的起因时,康浩坦诚说他文革后期在北京度过的时光和他多年来对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电影人的研究是最主要的原因。从5文革文化史6中对文革文化的客观评价以及他之前的两部专著中对新中国电影的理性叙述可以看出,康浩对文革的文艺不仅能以历史的眼光做出分析,对文

¹ 参见 Hsiao-ti Li, *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 1901-1937*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² 参见李孝悌《中国近代大众文化中的娱乐与启蒙》。载张启雄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页967-94。

³ 参见 Paul Clark, *“Hau hau”: The Pai Marire Search for Maori Identity*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1975)。

革艺术界的内幕也能挈其要领。

康浩的另一个长处是他对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关注。相比起国内,国外关于文革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文革结束前,就已有关于样板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发表。¹从1980年代开始,哈佛、印第安纳、海德堡等大学又相继举办了与文革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通常都有涉及文革文化(特别是样板戏)的论文。²虽然国内音乐界从事文革课题研究的人不多,成果也很少在专业音乐学刊外发表,但康浩仍能把握国内研究的基本倾向,并对其主要得失予以评价。如在论述样板戏的有关章节中,他不仅参考了戴嘉枋流传较广的两部著述《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对汪人元《京剧样板戏音乐论纲》等专论也颇多引述。对戴嘉枋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的有关知青歌曲的研究论文,也予以注重。但奇怪的是,他对梁茂春的有关研究成果似乎没有注意到。在别的章节中,他对居其宏、王宁一、汪毓和的著述也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但他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并非照单全收,如对王宁一《萌生、失落、复苏、发展:新中国音乐美学四十年》一文中只用几行就把文革一笔带过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康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避免价值判断。由于政治敏感性和情感矛盾的原因,1980年代中期国内文革音乐开始起步时,偏激的情感否定远较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为多。³即使是今天,心平气和地讨论文革期间音乐发展的论著,特别是博士论文仍很罕见。⁴文革音乐产生和成型的特定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政治色彩当然是康浩所不

¹ 参见 H ua- yuan Li Mowry, Yang - Pan His New The atre in China (Berk eley: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Cons tantine Tung, "The Hidden Enemyas Villain in Communist Chinese Drama", Educational T heatre Journal, Vol. 25, No. 3 (1973), p p. 335- 43.

² 如在 William A. Joseph 等编辑的《文革研究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 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中就有 Richard Kraus 写的于会泳与文革中的文化政策和 Ellen Judd 论述样板戏中英雄主义的论文各一篇。

³ 梁茂春先生在近期谈到他起初研究文革音乐时,就有音乐界的老同志劝阻他,对他说:“文革太丑恶了,文革音乐,也太丑恶了,应该彻彻底底地将它遗忘!”见梁茂春《让音乐史研究深入下去——浅谈文革 音乐研究》,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4期,页21。

⁴ 就笔者所知,目前与样板戏有关的博士论文有,但都出自综合大学,如刘艳《样板戏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语境》(南京大学,1999);卞敬淑《文革时期样板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金鹏《符号化政治——并以文革时期符号象征秩序为例》(复旦大学,2002)等。

能不关注的层面，但他更注意的是在政治高压下艺术工作者所显现出的创造力及其所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本身及其社会效应。《文革文化史》除从创作的角度涵盖思想主题、文本改编、创作思路、叙事模式、人物塑造、技艺分析、语言风格等外，还不忘从艺术消费的角度对观众及其传播方式和渠道进行观测。

康浩的著作素以严谨、认真闻名，但也难免出些小错。如把电影导演应云卫（1904 - 1967）拼为“Ying Y unei”，把柔石（1902 - 1931）拼为“Ruo Shi”，把《草原红鹰》的“鹰”拼为“yin”等。但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总体来说，《文革文化史》无论是对专业音乐学者，还是对喜读书的人士都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

作者简介：官宏宇（1963-），男，奥克兰大学博士，曾就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和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1997年起任教于新西兰国立 UNIT EC 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E-mail: hgong@unitec.ac.nz）。此文原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红色文化评论】

“文革健忘症”浅析

——如何评价毛时代的“红色遗产”？

阎长贵

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多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那就是整整1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比国共十年（1927—1937）内战的时间还长。对它的认识和评价无疑十分重要，在资政育人，即“资治通鉴”的意义上，实在不可或缺。然而，迄今对文革的评价上仍然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并进行着尖锐斗争。

我们首先看看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文革的观点和看法。他1975年11月3日，

对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评价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转引自胡松涛《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跟着毛泽东这种文革“基本正确”的观点，有人更夸张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比如，有位退休的局级官员（这位局级官员我认识，并曾有交往，恕不写出其真姓名了！）2017年撰长文，称赞文革有九大功绩：

一是实行了当代最广泛的思想解放。

二是实行了当代最实在的自由。

三是建立了当代最广泛的民主制度。

四是推进了当代最进步的改革。

五是形成了最好的社会风气。

六是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

七是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以及社会建设都进一步加强。

八是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

九是使外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他认为，上述客观事实充分证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步”以及他们所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结论，都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

2016年4月网上有篇长达2万多字名为《文革炼狱》的文章，其中赞扬文革说：

——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和完善。

——从文革设定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看，文革确实是一场深刻的、广泛的和激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是实现了它大部分的目标和任务的，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文革遗留的思想遗产很丰富。这主要：一是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和无产阶级文化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三是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树立全社会的平等思想。

还有人说什么，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上面那位局级官员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是违背基本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这究竟是“违背基本事实”，还是符合基本事实？

就让我们看看事实：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172万8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死亡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13万5千人，武斗死亡23万7千人，7百零3万人伤残，7万1千2百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3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2千万。

再看经济。由于“停产闹革命”，由于武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79年12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据统计，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文革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越来越少。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

元。从总体情况来看，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还有在文革中多少国宝付之一炬。九州大地各种珍贵遗物遭破坏毁灭的罄竹难书。有人说：“当年红卫兵在大火中砸烂旧世界，老奸巨猾的康生却在劫火中精选了上千件文物据为己有，这大约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贡献吧！”这话说得多么沉痛，又多么幽默。我曾有幸到安徽亳州参观以砖雕、木雕闻名的花戏楼（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该楼于400年前由山（西）陕（西）药商聚资兴建。楼上雕刻精美，其人其物，皆玲珑剔透，活灵活现，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不少参观者问及：花戏楼为什么在文革中没遭到破坏？讲解员说：当时这里驻有解放军，他们用泥巴把雕刻都糊了起来，并在上面写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造反派不敢动，因而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听到这样说，大家都唏嘘不已，一则赞扬解放军指战员的聪明和智慧，他们对付造反派的办法如此巧妙和高超；同时又有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灿烂辉煌的国家级瑰宝居然要这样保护，真是可叹也夫！可悲也夫！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就是文物大破坏、大浩劫。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陈云，1980年曾对起草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人语重心长地说：毛泽东“……文革有罪。”

基于文革这样的事实——基本事实，人们普遍认为，文革是“浩劫”，“十年浩劫”。这难道不完全符合事实吗？

应该指出，“文革浩劫论”并不是文革后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并不完全是“事后诸葛亮”——当然对很多人来说是“事后诸葛亮”，这没什么奇怪，因为错误往往事后才看清楚，这就是所谓总结和吸取教训，也非常需要。我这里想说的是，在文革中，还是文革早期，就有人公开提出文革是“浩劫”的论断了。一个是文革结束后又被枪杀的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他在文革初期即1966、1967年的日记中就写到：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参见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一个是上海音乐家陆洪恩，他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所谓有“恶攻”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


处死刑。在行刑前，即1968年4月20日，当局问他究竟是要死还是要活时，他愤怒回答：“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由于他态度“顽固”，他于1968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时年49岁。（参见网文《陆洪恩的故事》）不难看出，“文革浩劫论”实实在在是用鲜血换来的啊！

在文革后，明确提出“文革浩劫论”的权威人士是胡耀邦和邓小平。1980年6月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的胡耀邦提出了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黑体为笔者加）

到现在“文革浩劫论”的观点仍活在人们的口头上和媒体上，如2018年6月8日《北京日报》“长安观察”栏目《从四十年高考变迁体察中国社会进步》的评论说：“对于刚刚摆脱十年浩劫徘徊于历史路口的中国来说……”。

又，2018年6月18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第1131期有一篇署名吴敏的《“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其中有云：“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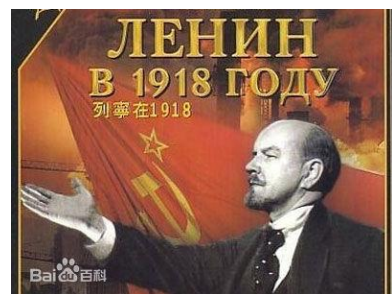
十分显然，“文革浩劫论”确实铁板上钉钉，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文革决不是什么“就是好”，而是“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毅），是“十年浩劫”。文革虽然已经终结四十多年了，但怎样认识和评价文革的斗争还鲜明而尖锐地存在着。“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我们如果不正视这场斗争，并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文革浩劫”还可能重演。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任何人都千万不可忽视和轻视！

【红色文化评论】

2018 看《列宁在 1918》

何與懷



年纪大些的中国人，对前苏联电影《列宁在 1918》肯定十分熟悉。在毛时代，物质和文化生活都非常贫乏，看一场电影对大人和孩子都像过节一样，而这部电影却因为经年放映而为人们所熟知。列宁睡在地板上，列宁抱着饥饿的孩子……一幕幕戏，都曾经让他们深深感动。“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面包会有的”这样的台词，还有列宁每句话后标志性的重复语，他激昂的演讲，其中的标志性动作，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都烂熟于心，争相模仿。以至于 2006 年根据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拍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仍然可以发现这部“红色经典”的浓重痕迹。

但是，在 2018 年再看《列宁在 1918》，就需要严肃地理论一下了。根据现在所公开的史实，这部电影篡改历史，充满了政治谎言。电影当然允许艺术虚构，可虚构的前提是不违背史实，特别像《列宁在 1918》这类政治性极强的文艺作品。而这部电影却捏造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是反十月革命和图谋推翻列宁政府的“人民公敌”。真实的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军事指挥者，也是当时红军的最高指挥官。真实的布哈林，是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成员、《真理报》主编。这两人当时都是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共产国际的缔造者和主要领导人，他们在列宁 1923 年的政治遗嘱中，得到了比斯大林更高的评价：托洛茨基“最有才能”，布哈林“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只是后来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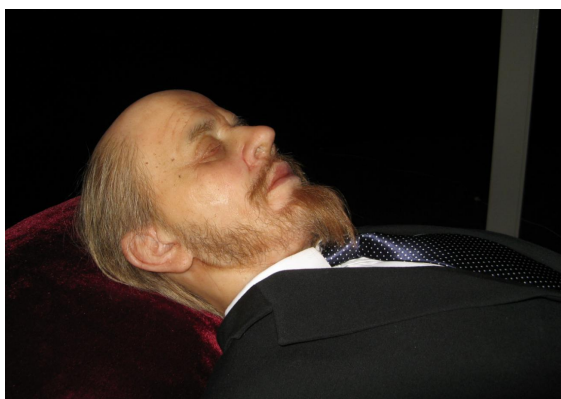
掌握了无限权力，他俩才被抹黑。这就是说，《列宁在 1918》实为一个为斯大林歌功颂德、排除异己的政治电影。

《列宁在 1918》的致命大错还不在这里，而是在列宁本身。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拿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钱的。更重要的是，他推翻的是本来已经胜利了的 1917 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

许多历史学家和苏俄研究专家已做出精辟的考证。当时，欧洲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契机。战争的痛苦和数百年来整个俄国社会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以及欧洲民主共和之路对专制落后的俄罗斯日渐其强的刺激影响，终于使得俄国革命触而即发。仅仅是在 1917 年 2 月的一个早晨，只因为彼得堡的居民买不到面包，革命就突然地爆发起来了。只是八天功夫，一场和平的史上称之为“二月革命”便大获成功，统治俄罗斯长达 304 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冲垮了。共和制地被确认，象征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蓝白红三色旗”开始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专制的俄国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1917 年二月民主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超越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努力……

1918 年 1 月 5 日，乘俄罗斯共和国还没站稳之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后改称俄国共产党）悍然发动政变，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斗争。仅 1917 和 1918 两年被列宁的暴力政权“正式”处决的就有一百万人，其他被疯狂镇压屠杀的更不计其数。例如，1921 年 3 月 1 日，一万五千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朗施达德举行反抗布尔什维克大会，列宁立即命令六万军队向他们进攻。十天之后，一万五千人的尸体，就横躺在了俄罗斯阴沉的天空下。列宁说过：“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万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还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今天世人都把斯大林看作二十世纪三大恶魔之一，而在列宁和斯大林身边工作过的苏共元老莫洛托夫，在谈到这两人谁更凶狠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告诉人们：“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许多中国人因无知而忽视或干脆故意遗忘了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胜利,以及一个月后创建,却被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颠覆了的俄罗斯共和国。去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俄罗斯历史学家和该国当政者已作出共识:“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所谓的革命,而是反革命。很多人还在思考:如果当年没有列宁和“十月革命”会是什么样子?人们说,起码不会有饿死,不会有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的内战,不会有两百万俄罗斯精英人士大逃亡以及农民阶层被消灭,不会有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主导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甚至,也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上台是靠着德国左翼阵营,而其最早的领导人受到苏共的



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整个世界的现代史都将被改写。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斯大林不顾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强烈反对,决定永久保留列宁的遗体以供后人瞻仰,于是,享年五十四岁的十月革命领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具

(澳华美术家沈少民装置艺术作品:《水晶棺里的列宁》)水晶棺的享用者,虽然据考证,被称之为人造水晶的,不过是高铅玻璃。那个年代,保存遗体是一个医学大难题,幸好有一位名叫泽巴尔斯的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从此,这位科学家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他被斯大林送进监狱之后,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事业。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列宁遗体还是逐渐腐烂,从小面积到大面积,即使不惜工本抢救也回天无力,最后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现在,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五,有关人员按时打开水晶棺,给列宁面部涂上特制的防腐材料。苏联解体后,政府不再拨款维护遗体。普京的话是:谁热爱列宁,谁出钱。倒是挺公道的。

“把列宁送到中国去!”据说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声音。也许还有些中国人非常乐意,好让他们也躺在水晶棺里的伟大领袖有个伴。🔥

【述 往】

独自生存（一）：感谢怡悦

贺美湘

李南央：贺美湘大姐的故事



今年十月回北京探望重病的父亲，同从长沙来的大表姐在医院聚首。离开医院后，我们谈了很多，她提到了一位因文革武斗而高位截瘫的同学，和同学们几十年来与她之间相互的关爱。

我看过马笑冬和叶维丽合著的《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文革中将校长打死，跟文革前学校对学生的极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我自己是北京女十中老初三的学生，在文革中经历过同班同学对我的批斗。我不知道北京有哪所中学的学生会对一位因文革武斗而受伤

（一九六八年贺美湘在医院）致残的同学有如此长久的关爱。我想，我首先是被大表姐所在的长沙一中，在那个人性丧失的疯狂年代里显现出的人性之光所震撼了。

谢谢贺美湘大姐，谢谢大表姐，谢谢曾经存在多年的贺美湘基金会的负责人林敏大姐同意将她们的故事转交给《记忆》。在看过贺美湘大姐的文字后，她的故事折射出的文革年代的荒诞，荒诞年代独立思考和人间关爱所产生的力量，让我为自己曾经涌起的对贺美湘的同情而感到羞愧，她的人生感悟又有几个健全人能够悟出：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会有一段黑暗，或长或短，或浓重或灰暗，它是一个自我了解、自我定位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确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自信、寻找自我的过程。

如果他一生的意义就是忍耐无穷无尽的痛苦，如果他的一生的成功的顶峰竟没有一丝欢乐的笑容，一丝灿烂的阳光，这样的痛苦和这样的忍耐以及这样的成功，对于我而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不是我要的东西！

我希望《记忆》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告诉后人。（2018.12.30.）

偶然查资料发现了文学视界，为它丰富的书籍收藏所折服，于是想到后花园看看。而来到后花园之后，却有一种误入他人私宅的感觉。与园子里活跃的一群相比，我真算是个另类。这些年轻人如此有才华，有生气，有知识。真是英武神明文武双全黄蓉再世啊！而我算什么呢，蚌的千年的眼泪酝酿出晶莹的珍珠，而我的伤痛和思索只能蜕变出硕大无朋百无一用的结石——谁会在意这无用的东西呢？于是我做了潜水员，有时留言几句话，是为不愿意被淘汰而挣点分。虽然有些贴读起来确实有趣，我的跟贴写的也是自己的真实感想，但我不以为有人会在意我的意见。

但是怡悦在意。当我接到怡悦的短讯时是很意外的，居然有人会对我的百无一用的结石发生兴趣！我由此感谢怡悦，她让我知道我的这颗结石也有它的价值。她说，“我要早半年看见你的这些文字就好了。”我听了，真觉得拖欠，我太多虑也太懒。

今天又看到有菁菁MM建议我另开一贴，如果可以，我会慢慢说一些我的故事。

先把给怡悦的回信贴出来，算是对她治疗的祝福吧。

冷水泡茶你好，我是怡悦，看了你在《如何说再见》里的回贴，又看了你其他的贴子，很想你讲讲你的情况，看我能不能学。

我看你的文章，里面讲到你四岁时妈妈就走了，是真的吗？你对母亲的记忆有多少？你的成长过程顺利吗？

还有你和死神对恃的经验，能跟我讲讲吗？

本来期望检查结果出来不用向你请教的，但事与愿违。

我本来有练静功的，但也不知道练得对不对，能教我吗？

问了你很多问题，你方便就回答，不想讲的就不要讲，我明白里面有你很多隐私，本不该问的，冒昧了。

心情不好，写得也乱，请谅解。谢谢！

怡悦

第一封信

怡悦：我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告诉你，如果它们对你有所帮助，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我的妈妈是54年初过世的，我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只有四岁半。我应该算记事早的一类孩子，但对妈妈仍只有支离破碎的一些片段记忆。吊丧的人不断经过我们三个孩子身边，我记得有人说道：“真可怜啊，孩子都还不会哭呢。”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伤心。妈妈死了，妈妈没有了。它只是一个事实，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意味着什么，那完全在小孩的意识之外。

我的感觉，4岁至6岁是孩子成长极重要的阶段。当时我母亲托孤我的姨母，即她的姐姐，我一生最亲的人的记忆，即是我的姨母。她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到乡下。4~6岁的孩子亲近大自然，对他们的一生有极好的影响。

我姨妈是个寡妇，待我们视同己出，我们把她完全当自己的妈妈看，这个期间，我们对后母话题是极抗拒的，除非后母就由姨妈担当（众亲戚有此一说，但父亲未必有此打算）。后来世事变数多多，7岁刚上小学的哥哥溺水身亡，我们回到城市，开始东寄西寄的流亡生涯，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时我和妹妹极希望有个后母，已不再只限于姨妈了。小孩子如果不再排斥后母，他们的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一定处于糟糕的境地。人们的关心是有距离的，亲人的近距离的关心和好心人的有距离的关心完全是两回事。

我父亲是个本分人，沉默寡言，不善于和孩子交流，他曾打算再婚，两次都没有成功。他是邮局的老工人，一解放就旗帜鲜明地拥护共产党，很快被重用。他只读过三年私塾，那点文化连他自己的生活会应付不了。结果他由于工作上的事和领导干上了，想不开，得了“狂想型精神忧郁症”，他从此处于被迫害的痛苦中，等待他的女儿们快点长大帮助他、解救他。感情极淡漠，完全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他不再上班，我们的生活来源，就靠父亲的36元的劳保费。那时我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吧。

我和妹妹，就像野草那样，完全是在无人问津的状况下自生自灭地长大的。我妹妹的家长座谈会，只比她长一岁的我代表家长去参加，我自己的家长座谈会，我自己去当会上

的接待员，自己代表自己了。好在我们都是好学生，老师倒不需要找家长告状。我父亲一生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座谈会，即使在他患病前。

为什么没人操心的两姊妹学习成绩反倒很好，我想，如果孩子记性好一点，注意力容易集中，学习就容易上路。学校里学的东西很有限，学得好不好其实对孩子将来的生活影响不大，关键是学校生活对孩子有吸引力，可以让你知道她在她该在的地方。成长在正常的轨道上。我是内向性格，好象天生会读书。喜欢书，逻辑思维较强；妹妹性格外向，伶俐活泼漂亮，善交往，很聪明，我曾在她面前很自卑。以她的资质，本应有更好的收获，却是一生不如意多多。我的体会是，读书时成绩好不好不是很要紧的，关键是你的生活中要有让你崇拜的榜样，让你有模仿的对像和学习的目标，这样你才有一个发展的空间。遗憾的是我们倒是别人的学习榜样。我不知道我如何去发展我自己。书的品种很有限，书的来源很有限，书的内容很有限，对书的诠释很有限。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封闭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沉默的，这是我少女时代最苦恼的事情。而现在这个问题已完全不同了，孩子接触的信息极多，有个长者的关心和引导是很重要的。

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就存在，我们属于平民阶层，要突破这个层次进入新的发展空间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智慧，做为孩子的我身边缺乏值得信赖的长者，他把他生活中失败和成功的积累袒露于你，不粉饰，不曲解，成人如果能和孩子如此坦诚地交流是多么的好啊。成人的世界就是孩子将要进入的世界，成人的苦恼和思考、观察、经验，是孩子要进入的世界的真实的信息，早早接受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只有好处。所以我很不赞成对孩子进行欺瞒。她们应该接受真实的信息，不了解不要紧，她们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去了解的。

我和妹妹的童年也仍然有许多快乐的色彩，尤其妹妹是个贪玩的孩子，她玩起来十分投入，至今也很贪玩。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母亲的孩子独立性远远强于一般孩子。没有妈妈指导当然会走许多弯路，但比起那些自己走了一辈子弯路还强制孩子走弯路的母亲来安知不是好事？我在童年曾很多次观察别人家孩子和母亲相处的情景，很少有让我羡慕的，当然这与我们那个时代有关，那个时代，爱真的很艰难。

4月15日

第二封信

怡悦：

我后来才看见你的第二贴，知道你病情的严重性。我的情况和你有很大的不同，我和你的情况哪个更糟就要看你对生活要的是什么是了。我在18岁上因胸椎四五六节粉碎性骨折而至完全性高位截瘫，至今已38年了。

我练过气功，由于受太多的局限，获得的功力有限，这些少量功力只能打破我身体原来的低位平衡而不足以建立高一级水平的平衡，对我的身体反倒是不利的，因而中止了。你如果需要气功方面的指点的话，我可以帮助你找到这方面的师傅。他可以在电话里给你所需要的帮助，他是香港人，现在香港行医，是个盲人，做按摩。练气功是为了治他的色素变性，练了二十多年了，虽然未能逃避失明的命运，但他的内脏得到很好的锻炼，身体却强健了。他信佛，人非常好。曾经给我许多气功方面的指点。不要怕麻烦人。没有关系的。

气功对于遗传性疾病和肌体实质性损伤的功能是有限的。而对于癌症的功能则因人、因病而异。癌症的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至今各种治癌的药物与其说的灭杀癌细胞还不如说是一种心理暗示，如果你不是容易受暗示的那一类，服这些奇奇怪怪的偏方恐怕难有起色。人们说癌变是由于免疫系统方面出了问题。气功对协调免疫方面的功能是有一定作用的。不管如何，你要放松些，对生死看开些，这对你自己，对家人，对治疗，都是很必要的。

4月17日

“冷水泡茶”来历

六月同学问我“冷水泡茶”有什么典故。这个ID是有点怪。我用它，首先，不会有重名；其次，我是个悟性迟迟的人，一个问题说不定想上二十年，还没有想清爽，想不清爽，搁在那儿，不着急，下次会有机会闹明白。好比泡茶用冷水，那茶味什么时候才

出得来呢？总归会出来的吧。泡茶的最好温度是80℃，这个温度下出来的茶味香郁悠长，好比看问题敏锐又准确的人对事物的洞达透彻，这种理想境界不是我等平庸之辈所能企望的，但比起用100℃冲茶的急脾气来，茶叶烫烂了茶味也改变了，倒觉得安分守拙，笨笨地慢慢地等茶味出来的好。

“冷水泡茶慢慢浓”，是我父亲难得的一句智慧而幽默话语，我用它做了我的ID，是对他的一份纪念。这句话如此的朴实却包含着那么深邃的生活哲理，从他那样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真的使我十分震惊，我感到在他内心的深处，存在着一片被人包括他自己遗忘的沃土，他的大脑有一部分损伤了，有一部分还在发挥正常的生理机能，而最好的一部分，却在那里荒芜。他总是拒绝交谈拒绝沟通，除了几句“吃饭”“睡觉”不得不说的话，他便枯然面壁喃喃自语，和他的政敌进行永远没有结局的辩论。

我们很少给对方温暖灿烂的笑容，因为笑容女神总是那么忙碌，几乎忘了光顾我们。但我们也很少争吵，我们总是直截了当向对方亮出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别指望我！”这对我并不难，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指望不上他。我的底线就是，别在我的同学朋友面前出糗。我最怕他在我好不容易来个客人可以畅快交谈可以尽情讨论时他忽然菩提灌顶，来了谈话兴致，从刘少奇骂到林彪骂到以色列骂到小巷里叫卖甜酒的，不管懂不懂对不对他都那样的自以为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地卖弄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见解，让我无地自容，如果我的眼睛还可以忍着不流泪，我的心却无法不流血，更多的是，又流泪又流血。他明知道他这样做使我难堪又痛苦为什么还要这样？是故意？是病态？是守着那份他曾得志时的早已不复存在的虚荣呢？每次他的犯规往往导致我情绪的失控。而每次我的失控总是被两只煎得焦黄的荷包蛋的无声的道歉缓解。于是日子又循规蹈矩地走下去。他的固执和自尊里除了病态的部分，是否也包含着他知道自己的历程中有这么一片真的值得他引以自豪的沃土？我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他却已猝然辞世。时年74岁，时值86年秋，阴雨绵绵突然放晴，久雨的天晴真是美好，白天他还在笑嘻嘻地晒太阳呢，晚上就走了。我真觉得是太阳把他接走的。

他辞世时我的破碎的生活已经开始重建，我的个人最好的潜质已经被我开发和经营，做父亲的已经知道。这个伤残的女儿会要比他成功。他应该是放心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是他对生活压力的特殊释放形式而已，压力减轻甚至没有了，释放的需求自然就消失了。这个最伤害我的释放压力的特殊方式终于在岁月的流逝中不知不觉地消失。

他过世时我不让自己痛快地哭，不让自己沉入他离去后留下的空白里，不让这空白引起的愧疚把我带走。我是愧疚的，愧疚我省悟太迟，曾把“应该怎样”强加于他，更多地放大我的不幸，这不幸又反作用于生活对他的压力。其实我只要开发了我最好的一面，找到了我的自信，把我的生活中灿烂的一面完全地展开，那么他“应该怎样”就会怎样的。他是否对自己那份残缺的父爱有几分愧疚？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也许那属于他已被损坏尚未修复的部分。人对事不必太过奢求，他走时的安详和留在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空白就是我们父女的缘分。为了这份缘分，我要感谢生活，将我置于如此的情境，去解读这颗孤独沉默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由于先天的不足或者由于后天现实的摧残，都有不健全的被损坏的一面；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如意的一面，不要去等待和埋怨别人，从你自己开始，努力去把生活灿烂的一面打开吧。如果你的生活很不如意，很可能只是你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荒芜了。

对了，六月，我忘了说，常喝用冷开水泡的茶，据说对糖尿病患者极有好处，是否确实未考。偶在报上看到这么一说，本来是准备用它来糊弄问ID典故出处时用的。

我在和怡悦聊天后即将贴子贴出，并不完全是由于她说的早半年看见我的文字“就好了”从而以为自己的文字有什么惊人的说服力，因为早半年看见，她未必会完全接受，人总是首先服从自己思维的惯性的；再者，接受某种看法与病情得以改变之间也并无必然性的联系……

当是我还是决定把贴子贴出来，因为她的命运使我非常难过。而每个人，不管多么幸福快乐，谁又能保得住厄运决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降临到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头上呢？幸福、苦难、爱情、厄运、幸运、迷惘、孤独、温暖、冷酷……它们的综合才可以称做生

活。光懂得幸福光享受阳光是不能说就懂得生活的。生命的鲜活和美丽，不仅仅是由于她的青春和健康，也还由于她的苦难和意志。我和愉悦，都有存在的理由，我们的存在并不是有损市容，并不会破坏人们好的心情，但是人们在读完我们的文字后，欢笑的时候会暗暗多一份珍惜，一帆风顺的坦途中会暗暗多一份居安思危的心理准备。

我说感谢愉悦的另一层意思，是我告诉她我对自己的文字没有信心，但她说，“你讲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很惭愧，愉悦赋予自己更多的生存含义，而我是喜欢做美食家的，我总是守着自己的一份感觉，等着比我有能力的人出来做成一份美餐，玲珑通透，淋漓尽致，色香味俱佳，有如火焰的美食，我只要享受，共鸣，只消说“好啊，美啊”就可以了。我的骨髓里已积贮许多的寒冷和疲惫，我就守着自己这份老本（在中国，能够做到独自生存的高位截瘫的人又有几位呢），我的朋友亲人不会责备我的懒惰。但是愉悦这么努力，我也只好努力，去打开也许还存在的另一个空间。

我极理解人们毫无心理准备而突然被抛出生活正常轨道时，孤独又无助的心态。当我突然面对终生截瘫这样严酷可怕的现实时，已是我卧床半年之后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瘫痪”会和我的一生会有如此可怕的不解之缘。以为受了伤，等医生给做手术就没事了（科学那时在我的眼里是无所不能的），而医生一直说不发烧就会做手术的，为此甚至气管切开后的金属导管在我的气管里留置了半年。等到体温终于稳定下来，久等的手术却不见提起，我终于觉得有点什么不对，要一个年龄比我大几岁的同学把我的病历拿来给我看。我的朋友同学长期对我隐瞒我的伤情以及我将来要面对的现实（我现在也想像得出他们当时的震惊和措手不及，都还几乎是一群孩子），他们之间恐怕早已争论了许久：怎么办？怎么说？如何说？由谁说？什么时候说？……我要看病历使他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终于自然了结。看完病历，我才知道我的终生命运几乎在最初的清创手术纪录上就已基本确定，而久等不至的所谓手术，只不过是做个脊髓探查，不管探查结果如何，都没有实质性的治疗意义。而像我这样严重的枪伤（子弹击伤右胳膊，从右肋横贯穿右胸腔，击碎四五六节胸椎，再从左肩胛骨穿出）康复的希望几乎为零，而半年的毫无进展等于宣布康复

希望已完全为零。

看完病历的几天几夜我只是呆望着病室的天花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大脑只是一片空白。我怎么办？我的脑子闪过一个个相关的事和相关的人，首先是鲍尔·柯察金，可是明摆着他的一生不与我有太多相像的地方；接着是海英，《军队的女儿》里的女主人公，可是她有一个团队做她的后盾，而且她只是耳聋，并不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我又想起我们参观过的荣军学校，那些残疾的军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绣花、编织来继续他们的人生。可是我不是军人，那里是不会接受我的。……我并没有崩溃，我的朋友、同学太善良也太心软，低估了我的承受力。我不是一个肯轻易放弃的人，对于他们的一再询问，我终于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回答：“我是一个‘人’啊，我是一个‘人’啊！”

我的意思是：我只在“人”的意义上，去完成我的生，或者我的死。

仍然要感谢愉悦，她的答复促成我再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

回首当年，疼痛依旧

我以为我已修炼得炉火纯青，功德圆满，对三十多年的旧事，已如隔世，可以不动声色地提起，心态平和地叙说。不料那“一片空白”的记忆打开，那掏心裂肺的痛哭犹在耳际。一时不能自己，只好匆匆煞尾，遑遑逃匿。

我在说到“子弹洞穿”的时候，我几乎听到坛子里有人失声问“子弹？子弹？”我本来想把子弹这一页很随意地翻过的，由于意外、由于疾病、由于伤害、由于历史的误会，对于一个18岁而将终身高位截瘫的女孩来说，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可是话说到这个份上，半吐半留的，叫人听得不爽，好奇心和想像力会打扰注意力的。不如把故事说全的好。

是的是的，就是文革的武斗。那个时候，因为夺权在即，有个工厂的两派打起来了，都说自己是真造反，别人是假造反。根据“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的规律，吃了亏的一伙跑到军队的武器库去抢枪。守军没有接到相关的命令只能“君子动口不动手”，做说服教育工作，这个时候谁会听大道理呢，武器库失守是自然的了，各路豪杰只顾把枪炮往家里扛，我所在的组织是群学生兵，自以为爱国有责，便去拦截，也趁机过过拿枪的

瘾（要知道我们这一代是被《平原游击队》和《地道战》熏陶出来的啊）。散兵游勇的枪炮拦下许多，这个学生兵组织就变成“武装部队”了。适值有观点相近的组织派人来请我们去协助守工厂，于是就一溜人马开到郊区的工厂里。布告贴出来，自愿报名，我报了名。我和当时所有的激进的观点都不沾边，是个等中央收拾局面的温和派。我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只是因为那是个鬼地方，可能会死人，叫人害怕，我讨厌自己害怕，就硬挣着去了。一派守着这座城市，另一派守着相邻的另一座城市，郊区是两派武装对峙的地方，时有摩擦交火。血腥气浓起来，有人兴奋起来了，以为这才称得上够刺激的革命，有人谨慎起来，开始整顿纪律，也有借故离开者。我时时想要离开，因为这些流血是多么的无谓，如同小儿游戏。但我又不愿和离去的人同行，因为我不能怀着害怕之心坦然离去。我那时并不懂得，在无谓和无望的漩涡中理性抽身，实在是需要不同一般的大智大勇。优柔寡断之际，终于有很大的一次冲突暴发，双方死了许多人，枪声响了一整天。我是救护员，有人叫有伤员，我一鼓劲以标准60米跑的姿势和速度跑到伤员身边，趴卧着支起上身，用随身带的剪刀剪开他崭新的工作裤的裤腿，刚准备给他包扎，心里惊恐未定一边暗喜自己到底是不怕死的，一边还惋惜这新工作裤被剪坏，一声枪响，就动不得了，接着听见背上咕噜咕噜出血。我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伤员问“救护员被打伤了吗，还活着吗？”我说“我被打伤了。”他说你压着腿了，可不可以挪开点，我说我动不了了。有个女孩跑过来，把我挪开。我吩咐她做了一点事，比如给我拿一片止血片之类。她的声音发抖，好像在哭，没有办法给我包扎，我说，算了，你帮不了我，去找我的同学来。她哭着答应，跑走了。一切归于宁静，我趴在山坡上，静听着背上咕噜咕噜的出血声，天是那样的蓝，白云宁静而亲切地俯看着你，那种铭心刻骨的宁静似乎进入你的内心，进入你的灵魂。山坡那边有房子着火了，有妇女哭叫着说有人被打伤了……枪声和硝烟离我远去，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离我远去。我只觉得我的灵魂飘出我的身躯，和深邃宁静的白云蓝天相依，有思绪轻轻飘过我的意识：这就是死吗，原来死不可怕啊。原来死竟是这样宁静啊……

那个时候，多少生命就是如此飘然离去，真是命如蚁蝼……

那个才18岁的女孩，渴望自己能无畏地面对死亡，以为自己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勇敢，她哪知道这种无谓幼稚的勇敢，离真正的勇敢是多么的遥远……

当我面对一片空白而嚎啕时，我已经有了半年的截瘫体验，知道这种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光是尿尿都能把你腌臭啊。我的未曾展开的青春尽管不曾有过很灿烂的梦，也还有一些设计：比如升入高中考入师范做个老师，比如不再读书到我视为第二故乡的农村做个董加耕式的新式的农民，比如到我父亲的单位顶替他做个工人谦虚好学认真负责争取当上劳动模范……不必太辉煌靠克勤克俭有一个自己的家，就可以了，就知足了。但是这一切美丽和朦胧随着这一份长长的病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四个字：身残志坚。身残已是事实，志坚有什么意义，志坚有什么必要，天哪，“志坚”究竟是他妈的什么意思！


我的堂姐从路人的议论中隐约听见我的受伤的消息陪我父亲找到学校（他生平第一次到我读书的学校去，却是为这样的不幸），随后在同学的陪同下到了医院，可怜我那时还做着马上就会康复的美梦，曾叫同学不要告诉我的家人。这场经典的会面就是我叫他一声“爹”，眼泪要跑出来，忍着，他伸手摸摸我的额头（也是他生平对我的唯一柔情点的动作），眼圈有点发红，也忍着，也没有骂我或问我，问我也没法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啊。以后就尽职尽责的，每星期两次到医院来看我。坐坐也没什么话说，打道回府。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知道我终身要卧床不起的。我的妹妹晒得黑黑的，正在到处游荡，那个时候时髦的叫法叫“革命串联”，接到父亲的信，匆匆赶回，应该是晚饭后了，进门裂嘴就傻哭，哭个不停。哭得我心烦火起，便叫她出去，哭够了再进来。那天她后来好像就没再进来，不知是怎么也哭不够还是觉得我这个做姐姐的不通人情。我至今也不知道，我至今也没有问过。真是对不起他们啊，我那时对这些都不关心。我只想快点好起来，从来没想过好不起来怎么办。

而终于要面对“好不起来”这样的事实时，“我是一个人”就算是我的诺言了。

我知道，没有努力无庸言退，在这生死相争的半年里（有过呼吸停止抢救过来的记录），我的朋友同学尽他们的努力帮助我，女同学每三人值班3天，给我做饭喂饭，清理大小便，

清理呕吐秽物，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用抽痰机给我抽痰，如何两人合手帮我翻身，对我的无理任性表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宽厚。桌上永远有好吃的，学校每月给我15元的生活费，装钱的盒子里常有人把自己省下的伙食费搁在里面。有好书先给我送来，有最新的主席像章先给我留着。总找护士要最干净的床单给我备用，病情重时对着医生大喊大叫。男同学甚至到我家帮助父亲拣瓦，因为父亲说我家的破屋有48处漏水。……我欠大家太多，我常问自己，掉个个儿，我能这样对别人吗？我觉得我不能。我觉得自己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天生缺温柔理解这根筋。我何德何能，被几乎不认识的人们如此厚爱（同学来自各个年级，不同班次）？我不能任性傻哭呆哭要死要活。

大家开始客观理性的讨论将来，我说学外语将来搞翻译吧，有个特聪明特有见识的同学说，学英语的话，英国美国的文艺书籍进不来，只能翻译科技书籍，科技书籍特枯燥，还要专业知识，你没有专业知识啊。学俄语就更不用讲了，修正主义还有什么好东西？于是这个出路遭到否决。“志坚”的另一条出路就只有做奥斯特洛夫斯基了，同学们于是结论说，就学习文学创作吧。我不知道如何去做那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只知道我先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在家靠父亲是靠不上的，通过曲折的途径向荣军学校申请，当然阴谋未能得逞。我不知道当年邓朴方怎么能去福利院的，像我这样严重伤残福利院也是却之有据的。在等待归宿的一年多里混乱的政治局面终于尘埃落定，有人当官有人坐牢有人挨批斗受审查接受拯救，我的朋友渐渐离去，到广阔天地去了，我渐渐学会自己抓住吊链借力翻身，渐渐摸熟泌尿道位置自己学会插导尿管，借镜子的反照给褥疮换药，给自己清理大小便。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同学护理我的生活，我的妹妹仍然革命意志异常坚决地要求下乡，她不愿意呆在城市无所事事做个社会青年。做社会青年有违她的革命理想。

医院找我谈话，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回家吧。尽管父亲反对，医院仍然把我送回家了。医药费由民政方面埋单。（未完待续）

【述 往】



作者简介

鞠克光，1952 年生于太原。1969 年参加工作，先是在潞安矿务局王庄煤矿做矿工，后在太原钢铁公司第一炼钢厂做炉前工。1980 年后，在山西省内数家报刊社任编辑、编委、副总编辑，1995 年至 2012 年，在山西省万家寨引黄工程管理局工作。现已退休。著有系列散文“老克杂忆”等。

我与老师柯玲西

——一位初一学生经历的文革

鞠克光

柯玲西，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她是一名缅甸归国华侨，身材可比俄罗斯大娘，脸庞也像俄罗斯妇女，给我们做班主任时大约 30 岁左右，普通话不是太规范，大约是带点缅甸口音也未可知。

一个政治觉悟很高的归国华侨

那是 1965 年，我 13 周岁，考上了太原十五中学校。当时社会上盛传：臭七中，烂八中，收破烂的十五中。我对自己考入这样的学校，心里是不满意的。然而，一进校园，就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被柯老师宣布为少年先锋队在这个班的中队主席。

我在小学时，只当过少先队小队长，这回竟有如此际遇，喜不自禁，走路都连跑带跳的。为什么会有这等好事？考试成绩，应该说班上还有比我好的。家庭出身，可能是柯老师看走了眼。我填的是“革命干部”。可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且有“一般历史问题”，母亲出身更是“地主兼资本家”。只要稍微查一下“革命干部”

的填法，依照当时人们的认识，就大可怀疑。当然，是父亲让我这样填的，他以为他们夫妻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下一代就该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更有可能，柯老师是根据小学校转来的“档案”、“操行评语”挑选我的。我在小学六年级做过一件所谓“抓小偷”的“好人好事”，上过报，受到过表扬。小学校把这件事写入了操行评语，并且冠之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等雷锋式的语言。在那个突出政治的时代，这个就是资本。柯玲西是一位热情的爱国归侨，自然政治觉悟也是很高的。不久，柯老师还来了一次班干部改选，我又被选为班主席，这样，小小的我，13岁的一个小破孩，身兼中队主席、班主席、语文课代表、植物课代表。

在讲述柯老师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几位与她合作的教师。语文老师鲁西林，中年男人，很有风度，在学生中以严厉出名，做过多年的班主任。不知为什么，1965年时只能给我们上语文课（文革后才晓得，他有历史问题）。他选我当他的课代表，我喜欢语文课，自然尊重他。植物老师，女的，我忘记她姓什么，倒是记得她爱人姓金，教俄语，夫妇俩都是朝鲜人。这位植物老师，指定我为她的课代表。教数学的温老师很快就发现我不称职，多次批评我，不得偏科。我自那之后，就讨厌数学。但是英文课，我是不敢不好好学的。我首先学会的是：Stand up; sit down。当柯老师进教室时，每次我都要喊这两句。

初一第一学期的早晚自习课，是我占山为王的时候。我常常手执教鞭，在讲台上敲敲打打，而且还学着鲁西林老师的样子，把黑板擦当惊堂木，“啪”地一声拍在讲桌上，喊道“肃静！”全然不顾自己的功课，在那里整治纪律，其实有一半是在发“烧”。

星期天，柯老师还曾把我们几个班干部，邀请到她家去。她住在东缉虎营省政协院内，丈夫也是归国华侨，在省侨联当个什么官员。她家的屋子就一间，长条形的，当中作了隔墙，外边是起居室，里边是卧室。我惊奇地发现，她家里只烧买来的煤球，不烧太原平民家家都烧的自制煤糕；食物也“高级”许多，她似乎不会做饭，只煮挂

面、吃面包，根本没有我们天天都在吃的高粱面、玉米面。她家还有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我在柯老师家第一次吃到。

她甚至把我们当听众，给我们讲其家庭和自己的归国史。柯老师说：你们这些孩子不知道啊，国外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话说得我们懵懵懂懂，不知她为什么会说这个。她介绍自己的归国经历，什么内容，忘记了，好像是经过了多少斗争，和谁斗，也忘记了，因为我当时根本不关心华侨的命运，甚至世上有华侨这样一族，也是因为眼前的柯老师，才晓得的。但是，她下面的一席话，我们可都牢牢记住了：我家在缅甸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我从小不缺吃不缺穿，但是日子过得并不好，因为我妈妈原本是我家的丫环，是我爸爸强奸了我妈妈才生下我的，所以我特别恨这个资产阶级家庭。柯老师是真诚的。但是我们才13岁，根本还不懂人事，特别是对强奸两个字，特敏感，这两个字后边紧跟着的字眼是“犯”人的“犯”。这几乎就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女同学羞红了脸，男同学则不敢正眼看人。

虽然对柯老师的家事，没留下好印象，但是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英文老师，大家还是引以为自豪的。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同学们惊异地发现柯老师记笔记，用的全是英文，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十三岁的我成了批斗对象

初一的第二学期，我就被柯老师调整下来，不能当班主席和中队主席了。原因是我犯了“生活作风问题”。哈哈，别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我才13岁，到第二学期，也不过刚刚14岁，遗过精了没有，记不太清了。同院有个邻居小姑娘，自小与我一起长大，比我小五岁，当年也就9岁。整天脏兮兮的，不爱学习，爱玩。有一天放学，我在她家，玩着玩着，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抱起她来，使劲亲她的脸，她也不反抗，反而悄悄地笑。不料，有人推门进来，看见了这一幕。坏

了。我狼狈地跑出屋，灰溜溜地钻进自己家门。于是，此事被传的沸沸扬扬，有人据此汇报柯老师。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思想意识很坏，“耍流氓”。撤了班主席不说，还反复开班会批判我，我一句话也没有，只能听着。

大约是1966年的5月，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那个村庄叫辛村，劳动了20多天，班里同学在柯老师的组织下，开会揭发我，虽揭发不出什么事情，但大家都把我当坏人看。我抬不起头，甚至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流氓。在辛村的这一段，正逢村里搞“四清”运动，村子里也在开会。我还记得，村里有个所谓“四不清分子”名叫高兔子，夜晚，大队里组织社员开斗争会，我们也参加，高兔子穿一身黑衣服，站在批斗会场上，灰溜溜的样子。会刚开完，班里就有同学管我叫“高兔子”，羞辱我。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一回到学校，文革的风暴就来临了。先是批判“三家村”，学生们首先给鲁西林老师贴大字报，说他上课放毒，是“三家村”的爪牙。紧接着，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三家村”的小伙计，是流氓，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而且，给我的大字报比给鲁老师的多多了，也是我当班主席时耀武扬威，种下的祸根。一位同学在学《毛选》时，没带书，向我借，我没好气地回绝：你借“毬”了。这也成了罪行，大字报说我，污蔑《毛选》是个“毬”！这些大字报，与柯老师有一定关联，她是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她在班会上发动大家，揭发坏人坏事。我自然难逃这一劫。终于，全班召开批斗会，把我揪上讲台，大家不仅声讨，而且开打！一位同学，顺手抄起课桌上的铜砚盒向我砸来，铜砚盒在凌空穿行时，碰到了屋顶的灯管，改变了运行路线，才算没砸到我头上。我哭得稀里哗啦，委屈、自责，羞辱……。

当时尚是学生斗学生的阶段，像我们初中一年级就斗到这种程度的，在十五中也是仅见。校党支部当时还在工作，我们班的批斗会一完，就有人悄悄通知我，校党支部书记找我。书记是市里一位领导的爱人，叫崔启莘。我十分胆怯地去见她。她倒像个老阿姨，一边问我情况，一边给我抹眼泪，安慰我，劝我不要怕：运动嘛，就是这样，有什么情况，你也可以写大字报，我就不信，红旗下长大的、我们的孩子会是坏

人，资产阶级的小姐倒成了好人。你也可以写大字报嘛！这可是一语点醒了“恶梦”中的我。我带着疑惑和感激离开了书记办公室。显然，受到书记秘密接见的学生不只我一个，刚回到班上，就有同学来找我，要我和他们一起揭发柯玲西。我战战兢兢地写出了《看！一条资产阶级的毒蛇——揭发柯玲西》的大字报，说她给我们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从此，柯老师没有特别需要，就不再到我们班上来。而学校的文革运动，也转向了学生斗老师的阶段。

对专政和“红八月”的恐惧

学生斗老师的阶段，正是所谓“红八月”、红色恐怖的阶段。在八月还未到来之时的七月，我年幼的身心还受到一次摧残。太原市中级法院在杏花岭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要求各单位派有问题的人旁听，杀鸡儆猴。柯老师竟然指定要我这个刚届14岁的孩子去听。虽然学校已经有点乱了，但我还是听话的。我本来天天胆战心惊，岂敢不去受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宣判大会气氛森然，犯人中自然有强奸犯。我坐在会场上，犹如芒刺在背，不敢正眼看人！现在想起来，都想哭。

也是从这天起，我开始逃离学校。只要可能，我就不愿意踏入学校一步，反正学校也不上课了。不去学校，就在大街上逛，看到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在挨斗，被斗之人，有各种各样的罪名：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破鞋、流氓……。前胸挂破鞋游街示众者，围观的人最多，被游街的妇女，被众人肆意凌辱。到处都有抄家的，上房顶砸龙头、敲屋檐的。我预感到有一天，灾难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红八月风暴的高峰刮到太原时，大约在九月初。我的父母被机关红卫兵宣布为“驱逐”对象，勒令在三天内滚出太原。勒令的白纸贴在家门前。几乎是在同一天，班里一位戴红卫兵袖章的同学，到我家来宣布：咱们班红卫兵决定，你必须跟上你家走。也是奇怪，我那时倒不太在乎了，很轻蔑地说，不用你操心，我当然要跟我家走了。

我这一走，躲过了一劫：班里展开大规模斗争“黑七类子弟”的活动，许多同学受尽凌辱。后来，一位被整过的同学告诉我，他几乎自杀，想跳学校旁边的西海子。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到来，我父母又被“纠错”，允许迁回太原市。我又回到十五中。刚回到学校时，还心有余悸，但学校的形势，早已不是66年的样子。黑七类子弟们大多也加入了群众组织。我加入一个反对“血统论”的造反组织。而柯老师，我也注意到，她坚持站在党团员多的教师那一边，虽然她并不是党员。

我很快就杀到社会上去了，而且，义无反顾，绝不回头。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压抑得到释放。偶尔碰到同班同学，我的举动和形象，令他们大吃一惊。举个例子，太原市有过一个大型武斗事件，九五事件，红总站多达几万人，攻打只有350多人守楼的红联站十中据点，我就在那350多人之中。当我参加红联站游行时，站在大卡车踏板上作出威风凛凛之状，一眼瞥见有同学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瞪口呆，心里十分爽快。

1968年春夏之间，一位鼎鼎大名的高中同学找我。过去，我与他并无来往，面熟而已。这位却不惜自贬身价，反复吹捧我。吹捧完，提出一个要求：听说你有手枪，能不能借用一下？我当然拒绝。他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拒绝，又说：那么，你带上枪，跟我回校，参加一次行动，抓一个人。我问：抓谁？这位说：老保那边的教师杨鸿铭，这小子可坏了，整了咱们许多黑材料，其中还整了你的黑材料。我惊奇：他又不认识我，为什么整我的材料？这位说：他坏就坏在这里，凡是他知道的造反派，他都整了材料，他在日记上写着，你说过解放军军训，是带枪的刘邓。啊呀呀！我顿时火冒三丈，走！抓狗日的去。我实在是少不更事，一点不知道，这位高中生是在利用我。

我怎么会有手枪呢？我所在的组织“尖刀战团”是个小组织，本没有枪械一类东西。但是1968年的太原，武斗不断，枪炮常鸣，打家劫舍的事也到处传说。一到下午五六点钟，马路上如同禁街，偶有人行走，也是急急慌慌。家家户户紧闭门窗，每个小街小巷，每个院落都有居民实行连环自保，若是一家有事，会有全院出动，菜刀斧头齐上阵，以防被打砸抢。“尖刀战团”的头头，为求自卫，从工厂的“战友”那

里搞来若干自制武器，俗称“独角龙”，单击单发，用小口径步枪子弹，打不准，也射不远，听响声而已。我就是有这么一枝手枪。

行动的那天早上，我怀揣“独角龙”上了学校。多时不回校，学校已经面目全非，主楼被学生占领，操场上长满野草。杨鸿铭与柯老师所在的教师组织只能在学校大食堂的一角开会，这个会场就是我们要抓人的地方。高中的那位同学已经在焦急地等我，怕我不来。一见我来了，他眉头舒展，一挥手，身后闪出十几个身高力壮的后生。大家稍事计议，便大摇大摆进入了杨鸿铭们开会的食堂。只听那位高中生大喊一声，杨鸿铭！开会的老师们情知不妙，纷纷起立。而杨鸿铭，这位小个子老师，则不动声色，怒目相视。那高中生说声：上！众同学呼啦啦围了上去，就要动手抓人。好个杨鸿铭，竟然喊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边喊边就要逃跑。我掏出了手枪，扫视全场，看到了一双惊恐的眼睛，柯老师正胆怯地看着我。我举起了枪——朝天，扣动扳机，枪响了。全场震惊。这也许是十五中文革史上的第一声枪响。几位同学顺势而上，杨鸿铭像一只羊羔一样，一直被提溜回他自己的单身宿舍。那次事件，可能把柯老师吓坏了，她可能也从此认定，她那个学生就是个暴徒，就是个坏种，当年选他当班主席是大错特错，当年开会斗争他，实在是应该。我也暗暗吃惊自己的胆子，柯老师那胆怯的面容、惊惧的眼神，我至今记得。

当了矿工的我街头偶遇柯老师


我这支手枪，后来在收缴武器时，当然是上缴公检法军管会了。其实，就是不上缴，拿着，也没用，我厌恶武斗了，厌恶社会总是乱哄哄的。这点倒是也与毛主席的指示相适应。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潮流已经来了，许多人都在讨论怎么去农村，和谁去农村的问题。一天，有“尖刀战团”的同学对我说，咱们一起下煤矿吧。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了，走，去煤矿下井去。一是煤矿比农村强，二是去煤矿政审可

能松一点，毕竟我们头上顶着“黑七类子女”的帽子。说走就走。我从哭着的母亲手里，强要出户口本，办好了去煤矿的手续，那年，我十七岁。

在煤矿过日子，觉得很长。天天下井，很累。闲下来，出外走走，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怀念城市，有一天，决定回去看看，特别兴奋。平日看见的穷山恶水，今天一路走来，感到山也在笑，水也在乐，心情真好。

车到太原时，才下午五点左右，熟悉的市容、熟悉的车水马龙，一下子扑面而来，恍如我根本就没离开过。我提着一个绿色大旅行袋，来到了最热闹的钟楼街、柳巷。耳边是熟悉的太原话，眼前是闲适的男女老少。怎么回事？走了那么多去农村的、参军的、下煤矿的，街上人似乎一个也没少。我微微有点悔意，为什么非离开不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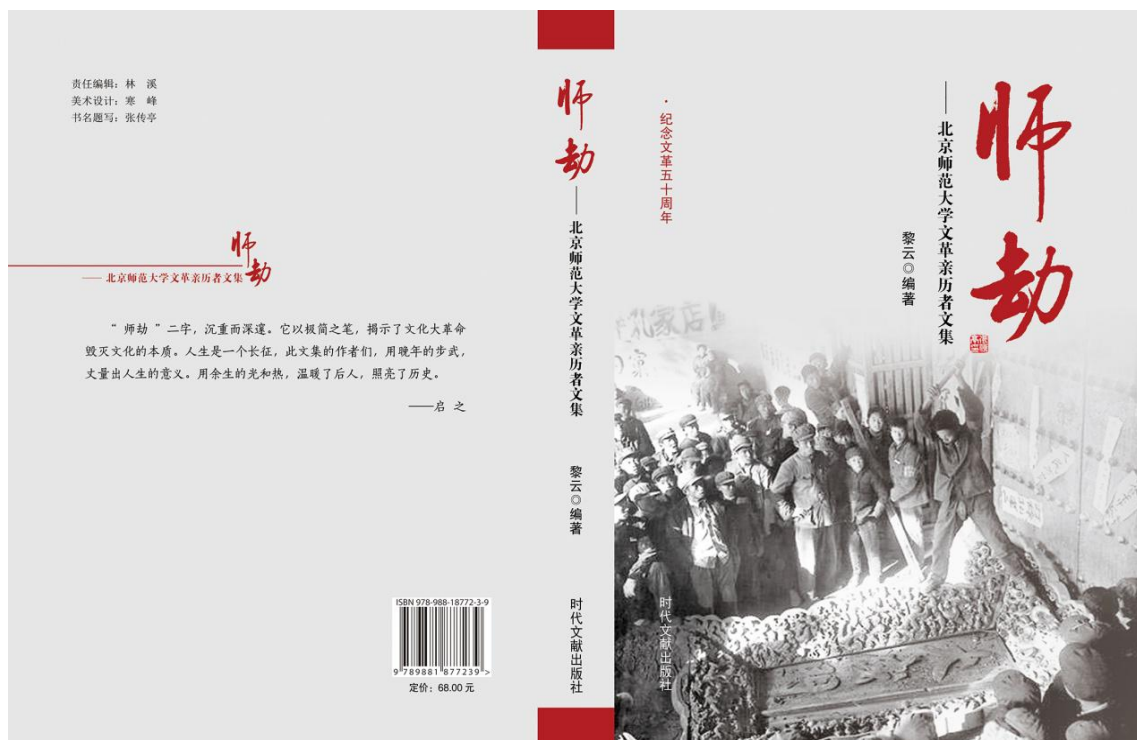
我沉醉在这笑语喧哗，长流不息的人群里。猛然间，我看到两个中年妇女的身影，一个是温润大方的黄老师，那位黄樵松军长的女儿，一位就是形同俄罗斯大妈的柯老师，她俩神态自若，手挽着手，说笑着朝这边走来。我有点呆了，一点没有准备碰到柯老师，我觉得她们还是可亲可敬，一点怨恨的意思都没在头脑中闪现，我直直地向她们走去，放下手中的旅行袋，站直，喊了一声：柯老师、黄老师。柯老师突然神色大变，身子往后一闪，似乎想躲到黄老师后边去，我看到她的手紧紧抓着黄老师的胳膊，惊恐之状毕现。黄老师不认识我，在犹疑间，问了声：是学生吧？我没想到柯老师见了我，竟如同见了虎狼般害怕，心中自然很惭愧。我说，柯老师，我去潞安煤矿当工人了，刚刚下汽车。柯老师啜啜着，没说出什么来，或许是慌忙中用了英文、缅甸语？我反正没听清楚。神色稍定之后，两位老师走开了。这，就是我同班主任的最后一面。呜呼！我做了什么啊，柯老师您把我当成什么了？

多年之后。同学大聚会，大家都询问，柯老师呢？有知道的同学说，柯老师早已经移居香港了。我默然。这位当年政治热情很高的华侨女青年，终于到了她本该去的地方了。 

【书 讯】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出版

黎 云



《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已面世。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援手：远在异邦者有之，身在商海者有之，师大子弟者有之，与师大毫无瓜葛者亦有之，几乎一听到是怎样一本书，立刻对各种“索取”慨然允诺。所有这些，使得此书堪称顺利地得以完成。为了答谢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更为了对北师大以及全国的“文革史研究”有所推进，防止文革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我们决定向关心北师大文革史的朋友们赠书，数量有限，欲索书者速与我们联系，请写清地址、手机号，通常以每人一本为主，特殊需要多寄者另外协商，赠完为止。此书只送不卖，寄书采用普通快递方式，快递费收书者自理（书到付款）。

联系人：1. 丛立新：clxaaaa@126.com2. 赵惠中：zhaohui8586@163.com

【文 摘】

文化是什么？（一）

龙应台

提要：

- ❖ 文化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它使孤立的个人产生归属感。
- ❖ 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 ❖ 文化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
- ❖ 文化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 ❖ 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冬夜凌晨 3 时，台北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 12 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 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 12 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 24 小时或 48 小时。在

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噼噼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粉墙下一株蔷薇

凌晨3时的议会其实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是底蕴？其实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然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将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问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农村人不知道仲尼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

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日子怎么过，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声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我，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的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在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兽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文化决定社会发展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乐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的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是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在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满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而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说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

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很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为“四郎”哭泣吧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以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一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

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勢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从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脸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人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只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星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字，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我明白了。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将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力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离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易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未完待续）

（此文选自互联网）

【文 摘】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二）

何 方

三 谈毛泽东确立的外交三原则

毛泽东的外交指导思想，首先体现在共和国成立前就定下的外交三原则上：“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既是遵从斯大林的指示，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定为国策带有必然性。实践证明，今天看来，这三原则是束缚我国外交的三条锁链：“一边倒”是主动放弃独立自主；“另起炉灶”是放弃二战后中国原已赢得的国际地位，实行自我孤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实行闭关锁国。对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来说，三原则失大于得，基本上是错误的。

（一）外交三原则的由来

三原则早有酝酿，最后形成是在1949年1月底2月初米高扬来西柏坡和党的五大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会谈中。米高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这里面有个过程。

从1947年初开始，毛泽东五次要求前往苏联见斯大林。在到1949年1月为止的两年内，毛泽东和斯大林来回交涉了十来次。1948年夏之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去谈打仗，特别是要苏联提供武器弹药。之后，是围绕建立新政权的重大问题向斯大林请示汇报。请示汇报是毛泽东的原话。他1948年9月28日的电报说：“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并得到）指示”。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日益接近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除了解放战争的扫尾事宜，他还需要向斯大林请教掌权后的执政方针。这时，他去见斯大林之心更为迫切了。因为仗一打完接着就要建立全国政权、开始经济建设和处理外交事务。这些都该怎么做？必须向斯大林请示汇报。只是他一再要求访苏，斯大林却一直拖

着。拖的原因，1948年夏之前看来是，中国内战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国共两方也可能打到以长江为界而停下来实行分治。在中国内战正打得很激烈、结果如何还不完全明朗时，苏联不愿立即直接插进来，以免和美国发生对抗。所以斯大林再三考虑，一直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他推托的理由就是，中国国内正在激战，更大的仗还在后头，需要毛泽东的指挥，毛泽东不能离开中国。不过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本来就不管战术战斗、而只是战略的制定者和大战役的指挥者，身在苏联照样可以指挥战事。因此尽管斯大林一再推托，他还是一再坚持要去。1948年夏以后，胜利已经在望，但斯大林还是拖着，他这时究竟如何考虑不大清楚。一直到1949年1月，斯大林才提出了个折衷办法：派米高扬到中国去。米高扬来了以后宣布，他只带了两只耳朵来，就是说光听中国党汇报，然后回去向斯大林报告，他本人不发表意见。

很多书上只是含糊地说，外交三原则是1948年秋1949年春形成的，但没有指明是在什么地方和具体场合下形成的。我后来查看我们五大书记1949年2月和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谈话，发现主要就是这个时候定下来的。那时五大书记都住在西柏坡，米高扬来的时候都参加了。谈的内容包括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政策的各个方面，中国的革命道路和中共历史。例如，政协怎么开，对民主党派怎么办，怎样建立联合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这次谈的。在汇报中有外交这一项，三项原则就是在汇报中基本成型的。

“一边倒”，后来是在1949年6月2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公开提出的。其实“一边倒”并不新鲜，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从陈独秀当总书记开始就服从共产国际，也就“一边倒”了。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开始，就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解散后继续服从苏共的领导。因此米高扬来，并无必要在他面前重申。在谈到整个外交工作的时候提到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条是新的。毛泽东说，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打扫干净屋子”，是因为中国这间屋子被帝国主义糟蹋得很脏，要清扫干净以后再同包括它们在内的各国建立新的关系。米高扬听到这个说法表示很感兴趣，说这种形象

的说法好，使人容易一下子就弄明白了。但因为他只带耳朵来，不能表示这些提法是对还是不对。

三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外交上的反映。“另起炉灶”，意思是毛泽东要我行我素，标新立异，自己另搞一套，不愿受国民党、帝国主义国家定下来的那套规矩的束缚。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中共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力求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应该说，提出这两条也有其必然性，只是这还扩大运用到了占世界大多数的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头上，而在这些国家中好多本来还是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只要回溯一下共和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存在的两条外交路线，就可以明白，外交三原则是基于毛泽东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他主张共和国成立后外交主要为世界革命服务，而不是主要为中国本国的建设服务。这就把清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影响，和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付担子连到了一起，统而名之曰“继续革命”。

“一边倒”，就是把自己降到世界革命总司令部苏联之下的一个方面军司令部的地位。“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和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切断它们同所谓旧中国的一切外交和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而从头“另来”。和西方国家虽然还是要做生意，但没有外交关系，生意很难做和做不大。外交如果是为国内建设服务，就不能在苏联阵营之外实行自我孤立、自我封锁。因为那时在产业、科技以至文化和教育上，走在前面、水平更高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当时对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的认识是，和它们，特别是和美国建交，要提出“不承认”帝国主义的方针，否则就不符合世界革命原则。所以他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它们的承认，反而会严重影响新政权的巩固。1949年初在西柏坡时，他就对米高扬说，不同美英等建交有很大好处，“可以比较容易地对中国国内的一切外国的事物施加压力，而用不着考虑外国政府的抗议。”1955年1月和苏联大使尤金谈起美国不承

认中国的问题时，他也说，这有“不少好处：可以给我们以自由，以反美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有八到十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1957年3月22日还说：“美国愈晚承认我们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它要是在我们这里有使馆，它就要在我们内部搞各种破坏活动。”这些表述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懂外交。因为两国建交与否和它们间的关系友好或敌对是两回事。建交国之间还可以开战呢，例如中印和中越的边界冲突。何况建交并不会妨碍毛泽东在国内做各种巩固政权的工作，包括在国内没收外国在中国的资产、镇反、进行反美宣传和改造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等等。斯大林进行“大清洗”就是在苏联和美国建交四年之后，美国又能拿斯大林怎么样？

下面分别谈三原则。

（二）“一边倒”

前面说过，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执行“一边倒”的政策，不管毛泽东宣布还是不宣布，都是必然的。为什么要“一边倒”？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例如有人说，刘少奇访苏时得到了苏联给中国援助的许诺，因此才执行这一条。根据是由计算时间得来的：刘少奇什么时间谈的，毛泽东“一边倒”又是什么时间宣布的。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情况。即使刘少奇没有访问苏联，苏联没有答应援助，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会是“一边倒”。宣布的时间也不一定是因为苏联答应了援助，因为毛泽东对苏联援助一直信心十足。他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里面就强调，苏联援助肯定会来！

事实上也是苏联一直在援助中共。解放战争后期和共和国成立后近十年的援助更是达到规模大、范围广而全的程度。决不能低估苏联援助对于中共夺权和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东北的情况看，苏联的作用就了不得。在东北的苏军把所缴获的全部日军武器和上千门美制火炮都交给了四野（先称“民主联军”）。要是没有苏联援助，东北不是那样容易就拿得下来的。而东北拿不下来，整个中国也就很难拿下来。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主要就是东北的四野打的。从

1945到1948年，东北的解放军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下子从十万人发展成百万人，还有了重型武器、坦克以至飞机。虽然多为缴获日本人的，却大都是在苏联提供装备甚至进行训练之下搞出来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迅速开始发动进攻。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苏联不仅在军用物资方面，连一些民用物资也援助我们。据我所知，林彪当时就曾直接给斯大林打电报，要求苏联提供被服和布匹，并答应用粮食交换。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工业设备多被苏联拆卸运走或遭战争破坏，但农业的破坏还不太大，老百姓该种地的还是种地，粮食产量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一边倒”的第二个根据，是因为毛泽东执行的是推动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领导世界革命有分工。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在很长时间里形成的实际状况，在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仍然承认联共即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中国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要服从全局，所以中国党要服从苏联共产党。而且当时说得很清楚，现在虽然共产国际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还是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刘少奇和斯大林谈话的时候，斯大林只是稍微辩驳了一下，说苏共和中共不能成为领导被领导关系了，但实际上他对中国表示的这个态度还是满意的。

谈“一边倒”的必然性，还应该提一下毛泽东的领袖欲。毛搞“一边倒”，和得到斯大林封官也有点关系。当时，毛泽东对于被封为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已经很满意。斯大林把这一大片地方交给他，对他来说也是再好不过。抗美援朝就与中共和苏共的分工有关。在分工后，他要表现一下作为一个方面军的司令的作用，就先在朝鲜和越南推进世界革命。金日成本来不想要中国管，后来只好跟着中国，因为中国分工管他，苏联又把好多事情往中国身上推。

怎么看共和国成立后“一边倒”的作用和影响？“一边倒”对中国有两大好处。一个是得到苏联援助。这个援助不简单，不是中苏关系破裂后一段时期只讲我们的自力更生，把苏联援助贬到好像可有可无的地步。那时好多东西都要苏联帮助。仗刚打完就要求苏联

派大批专家来，而且要得很急。比如解放上海，一开始我们还不那么快就把上海打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大城市管理。国民党的人是不能用了，交通怎么弄？下水道怎么弄？不知道。应该说，苏联有些援助确实是无私的。有些技术，苏联还没开始使用就拿到中国来了。1953年开始修武汉长江大桥，大桥使用的新浇注法，就是由苏联发明但还没在苏联采用的技术，经过苏联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部长会议讨论，他们决定允许先让中国用起来。毛泽东就非常感激苏联那个帮我们造桥的工程师西林。据说，在长江修的七八座大桥里，至今最结实的还是这座苏联援建的武汉大桥。若果真如此，那确是奇迹！

苏联的援助是大规模和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帮助我们初步建立起了工业化体系，使我们的工业在各个方面都打下了一点基础。重工业和军工，从飞机到拖拉机都开始有了一点。能自己把大学办起来，没有苏联的支援，也很难。那时坚决不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帮助创办的大学了，可自己又不知道大学该怎么办，只能找苏联帮。而苏联还真帮忙，提供苏联办大学的经验（造成对我国原有大学教育体系破坏性的校、院、系大调整），派出教授和专家，带来教材和各种有关资料。

“一边倒”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得到了苏联的保护。蒋介石炸上海，苏联派来三个空军师，就炸不成了。共和国成立时冷战已经开始。美国虽然并不想攻打中国，但是对我们的安全有威胁。在朝鲜战争、蒋介石想进攻大陆和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军方几次动过向中国投掷原子弹的念头。最后没有，顾虑苏联帮助我们用原子弹报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好处起码有这两条。但是整个说来“一边倒”的负面作用更大，不仅在外交上是错误的，对国家的整个发展都有不良后果。

毛泽东当时宣布的“一边倒”，没有说只是外交上倒向苏联，而是强调倒向社会主义。但我们长期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一边倒”的关键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照搬苏联虽然只有七八年，1958年以后开始和苏联分裂，但从苏联搬来的东西有很多却固定化了，一直影响到今天。计划经济就不用说了。1953年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苏联1920年“余粮征集制”的翻版。现在共产党的组织系

统、政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苏联那一套，只不过叫法有所不同。大学院系调整也是学的苏联。苏联模式的危害至今影响巨大。主要是：政治上专制，经济上垄断，意识形态上僵化，文化和教育相对落后。

“一边倒”在外交上的含义，首先是使我们放弃独立自主。这就会丧失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发展自己的机会。

拿中美关系来说，美国并不想帮助蒋介石重返大陆。它当时对中国只有一条：不希望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有材料说，美国本来准备给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条件就是中国不当苏联的附庸。1965年4月30日周恩来和加纳外长谈话时还说起过这件事。他说，1949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前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对美国友好，美国将承认中国并且提供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的贷款。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不“一边倒”的话，就拿不到苏联的援助。其实苏联不援助，还可以有西方的援助。而且即使西方提供了援助，苏联也不一定会因此就拒绝援助我们。问题正在于“一边倒”被西方了解为证明中国成了苏联附庸，因此不仅不援助，还要封锁。司徒雷登和罗隆基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就宣布了他的“一边倒”决策。因此罗不仅没敢转达司徒雷登的话，反而叫他赶快走，说是没有希望了。

苏联援助使我们有所发展，但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还只能说是太缓慢，还是大大落后了。我们靠苏联援助弄起来的工业体系同解放前的中国相比是进了一大步，但是用世界的发展水平来衡量，就显得结构差，产品数量少而且质量低。二战后国际上还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占着统治地位。我们的“一边倒”却使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这也等于脱离了整个国际大家庭，这就耽误掉了二战后国际化和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难得机遇。对外“一边倒”加上对内瞎折腾，使我们失去了二战后最好的发展机遇期。而且我认为，这次失掉的不止三十年，从全局和影响看，应以百年计。

（三）“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的意思，就是否定国民党的“弱国外交”。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外交不仅一刀两断，还要一切反着来，特别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要反其道而行。1949年1月

初，中央在西柏坡开会，专门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谈到共和国成立后同美英法的关系时，说我们是打倒它们，不是承认它们。我们全盘否定了民国政府外交，说它是卖国和丧权辱国的外交。这种说法其实有点过分。民国政府无疑是亲美的，但蒋介石也一直致力于求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并且取得相当成效。民国政府除了坚持抗日外，还在世界上进行了不少反法西斯和支持民族独立的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再加上同美英苏一起签署《联合国宣言》，中国就成了公认的世界四强之一。当时美英许诺战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但蒋介石坚持，不要等到战后，战时就废。结果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新约，废除了两国在华特权。之后，中国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分别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至于英、法、德、奥、意、日等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的租界，则从1919年开始到1947年，全部由中国先后收回了。当然，由于国家贫弱、政府专制腐败、民众缺乏觉悟，总之是自己不争气，无法真被别国看得起。在不少方面，中国的世界四强地位还是有点徒具虚名。

如何评估“另起炉灶”的得失？也和“一边倒”一样，有两个方面。得，是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枷锁。中国人感到可以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了。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因此遭受很大的损失。

有人只看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枷锁和制约这一面，没有看到中国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带来的严重问题。因为国际关系不仅有一套规章制度，还有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一整套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而且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我们既然“另起炉灶”，脱离了国际社会，也就可以违背国际上的成规和惯例。一方面这倒是省掉了好多麻烦，另一方面也就不能参与其中，分享既有国际规则对我们发展的有利内容，如二战后国际上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和照顾，《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等所体现的合理国际关系准则和现代化的价值观。

毛泽东总想在国际上别出心裁，自搞一套，在有的问题上可说是匪夷所思。例如他一度联合苏加诺，想甩开联合国，由新兴国家出头另立一个联合国。这个念头是毛泽东支持

印尼于1965年1月宣布退出联合国后产生的。这当然无法推行，最后只搞成了个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但举办过一次就难以为继了。这些，都只能是得不偿失或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国际关系中，许多问题都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维护或制约。为了“另起炉灶”，我们的有些做法却是公然违背国际惯例的。其中就有个继承的问题。就是说，不论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些事情如主权和领土范围，是各国都应当继承的。

首先，一国新成立的政权得到外国承认、和外国建交，就有继承性。新成立的国家政权一般都希望赶紧得到各国承认，好使自己在国际上具有合法地位，能和各国打交道；别的国家也理应尽快承认已能对国内实现有效控制的新政权。按国际惯例，只要两国政府申明彼此承认，就是两国建交的开始。“另起炉灶”却是不急于要别国承认。为此，就为建交定出条件：得先经过谈判。这样一来，好多国家就懒得承认了，或者是已经承认却不能很快建交了。一直到共和国成立后十多年，我们也只得到四、五十个国家，即只占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国家的承认并和它们建交，而且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和没建交的国家在国际上没法子打交道，连进行贸易都有困难。比如和日本就只能搞点民间贸易，而这种贸易同国家间建立正常关系下的贸易相差是极大的。

我们为建交设立了先谈判的条件，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不用谈判，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则“一定要经过谈判”。就连那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例如缅甸、印度，也要谈判。这些国家当然不高兴，但因为友好，事情还比较好办。缅甸是继苏联东欧国家之后第一个要求同我们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在1950年12月16日。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他给刘少奇、周恩来的电报立下了先谈判后建交的规矩。他说：请缅方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交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结果这一谈就是半年，直到第二年6月8日才和缅甸建成交。这是中国自己设置障碍。

不大友好的国家对我们这样做不以为然，就既不承认我们也不来谈判。我们和泰国、马来西亚建交都很晚。和泰国，后来是我们着急它不急，我们还请印度和缅甸帮我们去做

泰国的工作，最后才建成交。和英国更是谈判了二十年。本来英国对我们的态度还是相当积极的。共和国成立没几天，留在南京的加拿大临时代办就告诉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说已从英方得到消息，英联邦国家在承认共和国问题上将采取一致行动。英国政府1950年1月6日承认了我们，提出要建交。毛泽东不完全了解情况，以为英国有求于我们，只是想保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所以才那么急。其实英国态度积极和当时是工党执政有很大关系。张闻天正是根据这一点向中央正式提议和英国建交的。后来我读了加拿大外交官朗宁的回忆录，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他代表加拿大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我们的关系挺好。他在回忆录中讲，那时英联邦国家都准备和中国建交，但是中国要经过谈判，要求条件很高，英国先试了一下没谈成，所以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英联邦国家也就都不谈了。

这一耽误，就是十多二十多年。只有印度因为同属第三世界，又是长期的殖民地，命运相似，这时又早已独立，所以很快和我们建了交。英国和荷兰，都是一开始就承认我们。但和它们到1954年才谈成半建交，只互设代办处，一直拖到1972年才谈成和建立了互换大使的正常外交关系。拖这二十多年，实在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在建交问题上“另起炉灶”所确定的原则，我们自己有时也坚持不了。1962年我们想和法国建交，就既没有遵守国际间通行的原则，更没有按自己制定并坚守的规矩办，就是法国得和台湾先断交。我们向法国提出了先和台湾断交的条件，但是戴高乐说，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法国不能这样办。结果在法国还承认国民党政府、台湾大使馆还在巴黎待着的时候中法就建了交。只不过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脾气又很倔，说你既然承认了中共，那他就宣布停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把外交人员撤出了法国，才没有在法国造成同时存在“两个中国”的局面。其实这本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不过不合乎我们给自己定的规矩。

事实证明，共和国成立后头二十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

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其次，继承法的另一项，是各国之间的边界条约。如果不承认边界条约的继承性，那就会造成周恩来所说的“四至不定，四邻不安”。我们倒是并没有不承认旧的边界条约，但有时出于政治考虑，故意拿旧的边界问题做文章，在解决违背旧约的越界问题、有条约未勘界等问题上处理得不够妥当，结果在后来的边界划分等问题上吃亏不小，带来的麻烦也不少。

譬如，和相邻国家关系弄坏了，待解决的边界问题可以一直拖着；关系弄好了，又可以把领土当成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随便送给它们。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1949年以来，我们先后让给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朝鲜、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的领土总面积有四十万到五十万平方公里。

拿中国和先苏联后俄罗斯的边界来说，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对于沙皇时期订立的中俄不平等条约，我们长期不提，两国边界也相安无事，甚至有边无防。关系一坏，占领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就成了大问题。谈判边界问题，我方坚持首先得认定沙俄和清政府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这一历史事实，苏联坚决不干。因为要是承认的话，不就等于这一大片土地是侵占中国的。结果僵持了几十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完全“另起炉灶”，最后大体上还是得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办事，即考虑历史和现实情况，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这样就顺利地解决了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划界问题。

和印度的边界问题，则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其实，这也是我方的过失造成的。中印边境的主要争议地区，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逐步侵占印藏边境东部我方广达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我国已收复这一地区。没想到在我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实现停火时，毛泽东却下令撤出该地区，同时命令我边防部队再从藏印传统边界线（也是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20公里。所有这些撤出地区就自然成了不设防地区，

印度后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些撤出地区全部占为己有。静观了二三十年，看我方没什么动静，于是干脆把我藏南地区改建成一个邦（阿鲁纳恰尔邦），我国政府只能表示抗议和不承认而已，领土的丧失则是肯定无疑的了。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长卡西亚勋爵 1966 年在回顾中印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¹所以，李一氓等人把主动放弃经过战争收复的藏南地区和主动全线后撤 20 公里的决策称之为愚蠢之举，是确有道理的。

在和越南友好的时候，为了方便船运援助越南的物资，1957 年我们把解放军两年前解放的北部湾白龙尾岛正式送给了越南。白龙尾岛原属海南省儋州县，送给越南后，那里的居民变成了越南公民，他们抗议无效，很快就被带离这个岛子，分散住到越南各省，从此生活水平下降，和祖国亲人分离。²现在中越双方都不提这件事。我们是没法子说什么。越南占了便宜当然更不提，只讲那个岛本来就是越南的。1988 年 4 月 25 日越南公布了题为《黄沙、长沙群岛和国际法》的外交部文件，其中说，“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并于 1957 年收回”。它还把岛的名字给改了。1947 年民国政府出版《南海诸岛位置图》时划出断续线十一段。十一段线位处北部湾，中越北部湾划界后，十一段从此变成了九段。失去的这两段已经成为越南的海疆线。

在和朝鲜划界的时候，我还在外交部工作，知道当时是姬鹏飞去办的。根据中央（实即毛泽东）的指示，他就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白头山和天池的一大半分给朝鲜，特别是把鸭绿江和乌苏里江里面所有的岛屿都给了朝鲜。这些岛子有五六十、甚至上百个，原来多属中国，好多岛屿上还住着不少中国人，有中国管辖的城镇村落。按划分界河的通例，本来是应该按照主航道划界并决定岛屿归属的，但我方把两国边界一直划到了我国河边。

总之，“另起炉灶”对中国并不是好事，只是整了自己，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损失和麻烦。我们有意回避和拖延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严重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引进

¹ 伦敦《泰晤士报》1966 年 6 月 12 日。

² 于向真：《听妈妈讲越南的故事》，《记忆》2016 年 2 月 28 日第 109 期，第 60 页。

外资和技术，简直有点作茧自缚。共和国成立后头十年，连出国都只剩下莫斯科一条对外通道，到别的国家去得从莫斯科转。后来增加了一个仰光，还可以从缅甸转，也就只能经过这两个国家才能再到别的国家去。共和国成立后头30年这种自我封闭，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国人出国。后果是头30年出国人数只有28万，平均一年不到一万人。改革开放以后才使局面大为改观，2016年一年出国的已达1.2亿人次。你不出去，外面的情况不了解，对外办事只能瞎蒙。所以文革一结束，从华国锋开始，第一步就是派出一批代表团出国考察。东欧、西欧、北欧、美国都在考察之列，去日本考察的人最多。王震就是在1978年考察英国的时候发表了那句名言：英国就是共产主义，只差共产党领导而已。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等去了南斯拉夫，于光远又去了匈牙利，温家宝去了瑞典。在学术上也开始了对外交流。研究日本经济一时成了显学。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直到1960年，日本经济还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可是到了1980年，日本经济总量已高出我们近三倍。

（四）“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一条的重点是“打扫干净”，就是把外国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清扫得干干净净。因为有“一边倒”，这里的外国就只指资本主义国家。“再请客”，也是主动权在我，请不请，请谁不请谁，怎么请，那就看情况了。头三十年，基本上是不请。

这一条的积极方面，是肃清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影响。外国按不平等条约保留的特权，例如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就一扫而光。但是整个说来这一条的消极作用更大。和“另起炉灶”一样，这一条使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执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耽误了二战后的国际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经济反而是相对下降。

打扫干净，不仅使我们在经济上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断绝了关系，政治上和文化上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除了苏联，各国都争取外国资本到本国来投资，外资中还包括为数可观的无偿援助，特别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却连原来留在国内

的那点外资都没收了，外国还可能再来投资吗？实际上就是他们想来我们也不让，连他们想提供无偿援助，我们都认为是经济侵略。

毛泽东的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话出法随、立竿见影、当即变成政策。比如他说，帝国主义封锁正好，可以使我们“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从1949年一直到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毛泽东不知讲过多少遍：美国对我们实行封锁有很大好处，因为这就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到炼钢炼铁都得自己想办法。他对关起门来成就大事业抱着极大信心，说在美国封锁下我们反而能搞出六七千万吨钢。1958年全民炼钢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毛泽东这些话的违反常识、完全错误，已由邓小平指出，他说：“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还说：真正的开放，就是对西方的开放，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事实正是，对那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开放当然重要，但是不能作为重点，因为它们和我们的水平差不多。要引进他们的技术，他们有些方面还不如我们；要引进他们的资金，他们也正缺乏。最后真正的开放，还是对以美国为重点的西方开放。

我们除了在经济上闭关，对美英等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更是坚决清扫。西方，主要是美国在中国办的教会大学有二十所，这一扫，就把它全部接收了。十一所改为公办，九所改由中国人自办。美国在中国还有好几个慈善机构，办了多所医院，包括协和医院和湘雅医学院这两所在全中国有名的医院，都让我们给接管了。

在这方面进行打扫，道理实在不大。比如教育机关，美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和中学并不都是政府行为，除退还庚子赔款所办学校和医院（并不由美国政府管理）外，其余都是由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教会或基金会办的。这些机构来中国办教育办医院，当然要同时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传播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想要影响你。但这种影响不见得都坏。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高度评价美国的四大自由和民主制度。美国人崇尚民主自由，办学又讲究保护学生。他们对学生在政治上的取向远不如国民党那么注意，还看不惯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共产党学生受到国民党迫害，他们往往抱同情态度并出面保护。司

徒雷登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就保护过好多共产党员学生。他尽管被我们驱逐了，但他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曾要求把他的一半骨灰埋在燕京大学原址，只是因为我们的不让，最后妥协，埋到了他的出生地杭州。在国民党时期，学生中出共产党员多的还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北京有燕京大学，在上海有圣约翰大学，一段时期比例甚至超过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我认识和知道的不少同志都是从这两个学校出来的。比如黄华、凌青、龚澎、李慎之都是燕京大学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复三是圣约翰大学的。外交部建部初期的信使，绝大多数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地下党员。他们的英文好，见过洋世面，跑洋码头是不成问题的。

我认为，不应该有所谓文化侵略这个观念。要说美国人办学校办医院是文化侵略的话，那么我们在外国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不也成了文化侵略吗？孔子学院有两条，一条是学中文，一条是传播中国文化。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也无非是这两条，一是学外文，二是传播文化，也就是文化交流。他们办的教会大学和中学，不都给中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吗？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最大错误，就是使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和外界隔绝。原来留在国内的西方一套都扫出去，使它们的资金、技术、文化都进不来。受过西方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受到打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然首当其冲，连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级学者如叶企孙、束星北，也未能幸免。在经济技术上与外面隔绝，我们的经济势必要落后。文化上和国际隔绝，也要落后，因为文化和科学技术是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假设一下，在文化教育上，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办的大学中学和医院里原来的那些好东西扫出去，那只会给中国继续成批地培养出人才，包括像上过贝满女中和燕京大学的著名文学家谢冰心、出自协和医学院的著名妇科大夫林巧稚那样的高级人才！

“另起炉灶”也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好，其实关键就在要坚决肃清美国 and 西方在中国的一切影响，从政治、经济一直到思想、文化。这个思维至今犹存，只不过经济贸易领域除外。中央一些老领导总是喜欢讲“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中美必有一战”。这其实是伪命题。美国根本不会出兵占领中国，把我国沦为殖民地或附庸国。以美国为我

国首要敌人，指的只是美国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我们“亡国”，我们也无法因此就和美国打仗。对“和平演变”疑虑重重，和斯大林当年对“包围圈”担心受怕出于同样心理，其实是对本身模式的“优越性”并无足够的信心。

毛泽东的外交三原则一直贯穿到后来。譬如“一边倒”，提出时是全面倒向苏联，至今在政治体制上对斯大林模式的“一边倒”未变。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外交上转为倒向美国，从“联苏反美”变为“联美反苏”。这同样有损于我国的独立自主性。有一段时期，我国在美苏霸权争夺中实际上是和美国站在一边的。对美国的欧、日盟友，那时的重点是劝它们不要对苏联搞“绥靖主义”，甚至希望日本增加防务费用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加强日美同盟。对于亲近苏联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见面就说，得注意“前门拒狼，后门防虎”，要它们重点防苏。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彻底抛弃“一边倒”方针，在外交上实现了完整的独立自主性。

一直到现在，正统的说法还是坚持这三原则基本正确。传承下来，就是现在的“反对西化”。拒绝承认西方除了经济和科技外、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有先进的东西。这也只能使我们自己吃亏。应当承认，长期以来，甚至直到现在，科技文化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仍然是西方。所以鲁迅生前曾提倡“拿来主义”。就是政治上也不应该一味反对西方，其中还有起码比我们先进一些的东西。比如我们实行专制，西方讲求民主。民主有什么好反对的？而且，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我们事实上在好多方面已经在走西方的路。我们是在追赶人家，是在向人家学习，但是我们又宣称坚决反对他们的制度和文化。要是真的反对，那你就甘于落后，就别再追赶。其中有些人口称反对也是假的，实际上还是有点崇拜。在这些人中，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子弟弄到西方国家去上学、落户的也不少见。

毛泽东的外交三原则，在共和国成立后头七八年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是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和全面援助，使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挺起了腰杆，可以扬眉吐气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和印度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同不少前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又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威望大增。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打开和美国建交的大门，这就已经可以说完全进入国际社会，为恢复世界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重要外交成就。只是此时毛泽东已经改变了不同美国来往、拒绝进入联合国这一“另起炉灶”方针。

但从根本上说，三大决策都是错误的。在国际上四面树敌、陷于孤立，经济建设落后，都和这外交三原则分不开。三大决策不只是落后于时代的问题，而是造成国家不稳定，社会不成熟，妨碍中国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阻止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三堵墙。现在墙并未全倒，尚需继续努力。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具有两重性，说它基本上错误，不等于说它完全失败。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成就还是突出的。在有些问题上，战略上虽然错误，但策略和战术却运用得好，仍然能够取得一定成就。毛泽东在属于战略判断的时代问题上弄错了，但是，他的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一条线”的政策思想，又比较成功地联合了一部分欧美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大大拓展了我国的外交活动空间。这些都使中国明显提高了国际地位，赢得了普遍的尊重。

四，毛泽东外交决策的形成

毛泽东的外交决策是为他在中国建立专制体制服务的。他一向反对“西化”，其实就是反对民主化。一党专政本身就是专制，要保持专制当然就不允许西方的影响进来。

第二国际时期的国际共运，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都是左派。但是列宁和后两位的基本主张仍有所不同。列宁主张一党专政，他们就坚决反对。卢森堡有句名言：存不存在反对党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还是专制的标志；只要是民主的国家，就必须有反对党派。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列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俄国搞苏维埃制度，它们也坚决反对。但是国际共运仍然普遍尊重他们，列宁也是。原因是他们和列宁一样，都反对第二国际。这样两位革命者要求有反对党，还受到列宁的尊重，可见这种主张并不是大

逆不道。中国要不要一点民主的一个标志，也看允不允许反对党存在。没有反对党派就没有制衡和监督。现在政治上没有制衡和监督，就无异于政治上的放纵。你有权，你愿意贪污就贪污，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而且保密保得很严，谁也弄不清楚是哪些官员在搞贪污，贪污了多少。要是真正的反对党，监督就会很厉害，就会一下子给你揭发出来。美国实行两党制，民主党执政，共和党监督，反过来也是。哪个党想偷偷摸摸搞点小名堂，是不大容易的。本来没毛病还要给你挑刺，何况你有毛病；反对党会一下子给你捅出来，所以这互相监督的作用很大。

我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一书中，谈到过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外交工作中出过的一些纰漏甚至洋相。这里想谈谈与此相关的三点。

第一，毛泽东对外国情况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了解比较有限。他手不释卷，一生读书甚多，但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古籍。外国人写的书，他读的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为数并不多，也有少许其他人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毛泽东处理对外事务上的想法和做法，同他在相关问题上的知识不足有关。

邓小平到过法国和苏联，眼界比毛泽东开阔些。但他对外国情况的了解也有局限性。我国网球选手胡娜1982年到美国参加比赛后自行留在美国，后来又申请政治避难，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邓小平亲自出面向总统里根打招呼，结果竟然没能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文章，质问美国：国会和白宫，究竟谁说了算？这就得反问一句了：不了解美国和中国不一样，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制度，不像中国，事情是不能由最高领导人个人说了算的？

第二，毛泽东对全党全国事务乾纲独断，是延安整风后就立下的规矩。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1953年更亲自规定，凡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中央文件，不通过他一律无效。从此，再无毛泽东之外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能代表中央做出最后决定了。对外事务更是高度集中。这就使外交部这个职能部门很难发挥任何主动性和灵活性。周恩来从外交部成立时起就把“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定为一条铁的纪律。他带头这样做，事无巨细全都向毛泽

东请示汇报。大事就不用说了。就连发贺电唁电等外交惯例文书，甚至连宴请外宾时的中方参加人选、菜肴规格这些细微小事，都得上报毛泽东。包括部长和大使在内，外交部上上下下工作人员的手脚全都被捆得牢牢的。

正因外交授权有限，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他认为在国内碍眼碍事的张闻天外派出去，不让张闻天从事他兴趣所在的经济工作。毛泽东两次向张闻天交代，“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一次是在张闻天问他怎么做外交工作时，另一次是在伍修权陪同张闻天向他汇报工作时。对外要“不说话少说话”、“多听少说”，从此就成为外事工作者的一条工作准则。

周恩来办外交享誉国际，但深受毛泽东掣肘。他比较了解外界的客观现实，处理问题做得到切合实际，分寸也掌握的好。但他一是特别注意避嫌，生怕“功高盖主”；二是明明做得对也做得好却还屡受毛泽东无端指责，使他的外交智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例子十分突出。在周恩来领导下，我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外交成就。会议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却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说是没有突出台湾问题等。1973年毛泽东借外交部写出一篇如实反映美苏关系新变化的调研报告——153号《新情况》，竟然对周恩来发出“势必出修正”的警示；更借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一次会谈发难，叫江青领衔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

对于大使的任命，毛泽东不是看能力而是看是否服从和听话。他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地下党。他要将军们当大使，直截了当地说是因为这些人“跑不了”。

进入外事部门后，张闻天在联合国代表团、驻苏使馆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任内，深感外交干部的业务能力不符合工作要求。为了培养外事干部，他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如在使馆率先建立研究室、创办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外交学院等。刘英说，对张闻天在外交部的表现，周恩来是肯定的，但是毛主席没说过一句话。

第三，外交决策并未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决策没有“从群众中来”这一条，只有严格按中央即毛泽东决策办事的严格规定。

中央对外交部们调研工作的要求，只限于情报即信息的及时提供和做出一定分析。龚澎在司里多次传达过周恩来的指示，动向调研工作人员是当国际形势的“侦察兵”，观察形势必须做到敏锐，反映新动向必须做到准确、及时、简要，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只不过周恩来对于情报信息的上送有掌控：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材料，会写批语，请毛泽东和其他负责外事工作的几位中央领导人一阅；有的材料，龚澎只让写作者手抄一份，专送周个人一阅。）共和国成立初期，刘少奇当面向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龚澎交代过，你们搞调查研究等于炒菜，你们只要把要炒的菜分门别类备齐摆好就行，至于炒出什么味道，那是中央的责任。龚澎一再表示：对中央的意图和决策“不能议论纷纷”。当时外交调研人员都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不该问的绝不去问，也不会去思考不符合我们所知中央意图的政策性问题。我们的调研工作与学术无关，更不是去起“智囊”作用。在这种要求下做调研工作，质量很难达到多高水平。

外事部门一向强调突出政治。首先是必须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观察和估计形势。讨论世界力量对比和形势发展对我国有利还是不利，主要的一面必定是有利。即使不能不承认对我们不大有利，也一定会说明，这是暂时现象，从长远看必定还是有利。反映各国的基本情况，首先要看它们是敌是友。以美国为国家头号敌人时，美国在历史上和当前对中国所做的一切，无一不属于侵略行为或阴谋活动。当中苏亲密无间时，苏联什么都高明。当时在外交部做调研工作，连怎样观察分析国际形势，苏联的看法也是主要依据。一旦苏联“变修”，苏联从内政到外交，没有一条正确，分析国际形势也得和它反着来了。

在高度集中、严格保密、毛泽东的意图善变和对下管得严管得细的情况下，对外工作很容易动辄得咎。下级先揣摩上级意图再反映情况，已成痼疾。调研职能部门往往是报喜不报忧。上级不愿听到、下级不敢反映对中国不利、有损中国形象或同中央想法不符的真实情况，对外决策哪儿还能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之上？1971年7月允不允许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的意见是不允，毛泽东是允。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我们是派代表团去联合国还是不派？外交部的建议是不派，毛泽东却决定马上派

出代表团进联合国。毛泽东的决定当然完全正确。但周恩来和外交部原先的建议却符合毛泽东长期对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他们并不是根本认识不到该怎样做才对我国更有利，但他们不敢提出毛泽东没有提过或估计他可能不会同意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外交本应以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为准绳并为其服务，然而毛泽东却往往是从个人情绪和意识形态考虑出发。胡耀邦当年对此大概感受很深。他在1981年3月9日中央书记处第九十次会议上发表过一个不啻是对几十年外交经验教训总结的长篇讲话，其中就专门提到：一国外交，必须“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不要为领导个人情绪所左右。迁就眼前事变就是机会

主义。不要一将军就跳，不要为来势汹汹的环境和情绪所蒙蔽，所支配。”¹而指导国家头三十年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恰恰不都是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有许多是依据变化无常的领袖个人意志形势，使国家的内政外交都受害匪浅。

毛泽东的强烈个人意志和领袖欲，同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应对直接相连。

共和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急于巩固他的权力地位，开始打压那些影响太大的老战友。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对邓力群谈到高岗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确存在个品质问题；一建国他就想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着手削弱他们的权力。他和高岗几乎无话不谈，早就让高去秘密查阅刘少奇伪满时期在沈阳被捕的档案。他任命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高岗的权力一时极大，本人的声誉也如日中天。周恩来一度只能管外交部等涉外部门和几个具体项目。后来的所谓“高饶事件”，就是由高岗揣摩到毛泽东的意思在党内高层进行反刘、周游说未果而酿成的。直到生命接近结束，毛泽东都不放心，总是怀疑自己在党内和社会上的领袖地位有遭受挑战的危险，或在他身后遭到否定。一有所怀疑，毛泽东就会强调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紧张。

毛泽东最善于内外相互为用。国内外敌人里应外合相互勾结，内乱外战可能一齐爆发，

¹ 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第610页。何方在胡耀邦这段话旁批注：“值得大书”（宋以敏）。

已成为他的口头语。只要认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他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就一定是更为紧张。在这种时刻，他往往还会在国际上有意制造出点紧张，包括在境外挑起军事行动。

这一点，毛泽东又和斯大林一样。研究斯大林的俄罗斯学者说，斯大林二战初期对形势判断错误，使苏联遭受重大损失，同他对“‘内部敌人’的恐惧感”相关；二战后他对西方大国从合作转为对抗，是因为担心在国内出现新的“十二月党人”。¹

毛泽东对世界的认识，源自他的意识形态信仰，包括对时代的误判。

对于在世界革命中取胜，毛泽东一向盲目乐观。这来自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否定两种制度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无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和平竞赛，相信只要把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用于世界革命，也就是由世界农村——发展中世界的穷国弱国，包围世界城市——发达资本主义富国，各国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就能达到最后赤化全球的目标。毛泽东的希望和情感所在，在国内是穷人，在国外是穷国和外国的穷人。他喜欢结交外国的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说和他们在一起就高兴，赞美黑人兄弟看上去是那么美。毛泽东看不到更不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自我改善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爆发总危机走下历史舞台的依据，除了坚信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必将重现，还有一条，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严重，势必相互火并。共和国成立后首任驻英国代办宦乡 1958 年底就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破裂给外交部写了一个调研报告，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四分五裂。毛泽东十分赞许这一判断，给的批语是：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毛泽东这一条是从斯大林那儿来的。斯大林 1952 年批判了断定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加剧烈的看法，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在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的 27 年里，毛泽东两次企图领导中国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名正言顺地当上世界革命领袖。在这两次，毛泽东都曾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高得没边。他 1958 年 7 月 12 日对苏联大使尤金说，亚非拉三洲到

¹ 弗·祖博克，康·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宫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第 13-14,52 页。

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伊拉克就是这样，在欧洲同样也酝酿着革命。文革期间则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为世界形势主要特征、革命形势日渐成熟的证明，进而断言“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已成主要倾向”。这些估计和预言只能说完全出于臆想，但却是当时对内对外战略部署的依据，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大折腾的行动纲领。


毛泽东判断国际形势实在是有点浪漫主义。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做出革命形势大好、“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列出十条“证据”说明“国际形势已到转折点。”它们是：1，美英要求苏联帮助打败德日，说明同物质力量相比，决定问题的主要是人，是制度。2，中国革命；3，朝鲜战争，美国人也不过如此。4，越南战争，胡志明把法国打得呜呼哀哉。5，苏伊士运河，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英法两个帝国主义打了几天就缩回去了。6，叙利亚，美国人计划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不打了。7，苏联抛上两个卫星。8，英国退出亚非拉很大一片土地。9，荷兰退出印尼。10，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毛泽东根据头七条“证据”得出结论：“以上七件事说明西方世界被我们永远地抛下去了，苏联卫星上天，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也占了压倒优势。”这十条“证据”，包括头七条在内，意义各有不同，并不是对世界大势的确切概括，在相当时期内却是制订对外战略策略的出发点。

对世界大势的误判，就使他对世界上各类国家推行的外交政策不能不接连发生失误。过去对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既有在不同时期分别斗争过度的问题，又有先后为其所用、影响独立自主的问题。加之在国际上先后以美国或苏联划线，对美苏以外各国的态度，相应地也先后看它们对美国或苏联的态度如何。这就在不同时期疏远了中国和不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推动世界革命的思想和个人情绪的指导下，按“革命性”如何处理同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党的关系，更是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对象国的利益，还给地区安全带来损害。突出的如对待朝鲜和当年对待红色高棉。朝鲜核问题至今还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紧张的重大因素。

周有光老先生有一句名言：“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很赞同周老

的观点。中国以本国为天下中心和世界老大多居的历史悠久，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知之既少，还看不起外国。直到民国成立，中国才开始对中国以外的世界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国人第一次眼界大开。但共和国成立后又大为收缩，满足于只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安身立命，对资本主义世界尽力隔离和排斥。


毛泽东从来只按他本人的认识和情绪看中国看世界，而且全国上下都得跟着来。他对外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就是以他划线，以他为准。这就使毛泽东难以对国内外形势作出正确判断，无法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在毛泽东的统领下，国人上上下下都得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你死我活的观点看中国看世界，否则就会被看成犯下政治立场、危害国家利益的错误和罪行。

毛泽东外交决策的出发点和内涵，至今仍不时发生回响。这大概是因为，在党国体制下处理对外事务具有一定的惯性。邓小平对于时代特征和美国看法的转变，是对毛泽东外交的重大突破。但他的转变从一开始就限于对外。一旦出现被视为有损党国核心利益的外部因素变化，就难以按他本人提倡的从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出发来考虑对外问题并做出应有抉择了。

选自《何方谈毛泽东外交》

【封面说明】

寡人无疾

毛泽东在延安就呼唤新人物新世界，建政后，更是大力推行新思想新文化。毛文化从此成为立国之本。其荼毒心灵至文革而登峰造极。后毛时代，毛文化继续深入国人骨髓，扭曲国人灵魂，毒化国人灵魂。犹如黑色污垢附体。去除污垢，清理文化，乃当今要务。而讳疾忌医者众，如当年之蔡桓公，扁鹊四劝，仍以为寡人无疾。（鄒 行）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二、定制服务：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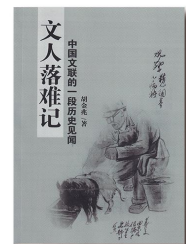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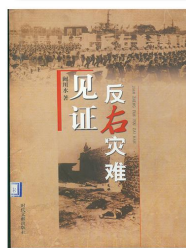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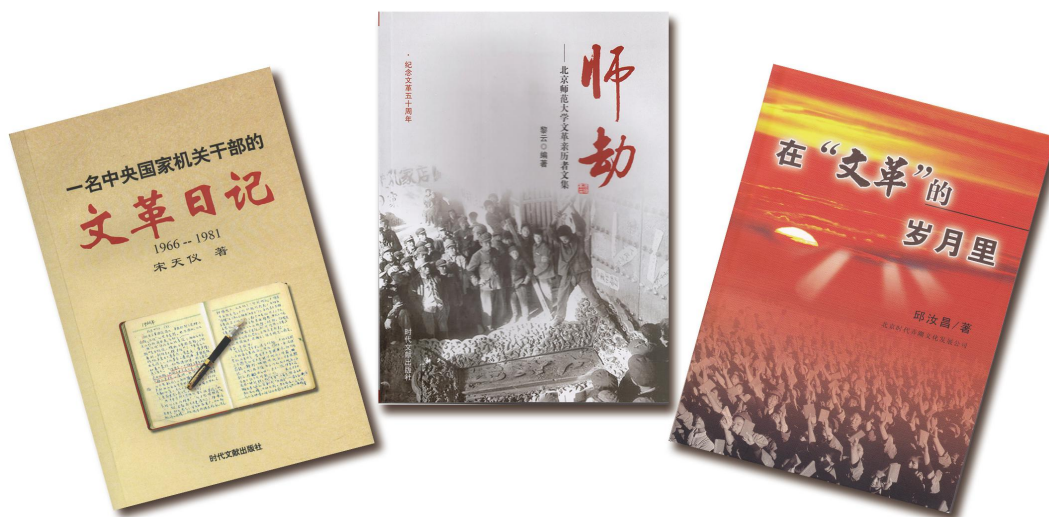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記憶》歡迎捐款，捐款者請联系方惜辰先生。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